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 《记忆》324期

### 【思想文化】

蒋南翔：我也喊过“打倒蒋南翔”

——文革随想录之七/老方

### 【百年国史】

文革权力之争的整体框架/谢阳秋

画说我的一生（27）/刘海鸥

——秀才下海，三年不成（1983-1985）

### 【怀人】

写给明天的纪念

——我的父亲沈力/言真

二姨妈，二姨夫（下）/张保和（美）

### 【述往】

入党没入伙

——父亲口中的徐向前/李飞飞

我所经历的北师大“清队”/安希孟

六年芝麻官

——一个县委书记的实践与思考（五）/李辅

### 【资料】

教育部革命联合委员会批蒋战斗队（1967年3月24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反党罪行50条（一）

### 【读者来信】

1. 越人谈321期彭德怀一文

2. 胡之杨问《清华文革亲历记》的出版情况（编者回复）

3. 余敏玲谈《镇反沉冤》的编排（编者回复）

### 【本刊声明】

## 【思想文化】

**蒋南翔：我也喊过“打倒蒋南翔”**

老方

罗征启在《清华文革亲历记》中用了两章讲他的导师，建筑系副教授黄报青先生：

文革大动乱开始以后，戴高帽、游街、批斗干部老师是平常事。但是黄报青先生就不平常了。在批斗时，黄先生坚持蒋南翔是好领导干部，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喊“打倒黄报青”可以，喊“打倒蒋南翔”坚决不行。他找出许多报刊资料，说明中央一直肯定蒋南翔是好的领导干部，怎能一夜之间要打倒？一次再次，他宁愿挨打至尿血，被赶到小河中，但绝不妥协。

1966年9月在东大操场“劳改”时，大家蹲在地上拔草，刘小石（系党总书记）悄悄对我说：“报青被打得不行了，你和他比较好，跟他说说，叫他别顶了。”我慢慢移动到黄先生身边，对他说：“黄先生，您不要顶了，中央的意图我们也搞不清楚，硬顶没用，保护身体要紧。”他说：“要打倒我可以。我现在要拔草、劳改，都可以。但是要我说打倒蒋南翔，打倒共产党，这不可以。”我说：“你可以不说。”他说：“不是我要说，是他们逼我说，我又不能说假话。”我又说：“不是要你说假话，但你可以沉默。”他严肃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有些话不能不说。”这样，他被反复批斗、用刑，导致精神崩溃，两次送进安定医院。出院后，他沉默不语，每天不停地抄写毛主席诗词。

1967年12月的一天晚上，黄先生正在五楼的北屋写字，听到大礼堂方向老团的大喇叭狂叫：“罗征启，黄报青搞假四清……”他开了北窗就跳下去了。黄报青先生死后，老团还不放过他，批他死有余辜，批他“叛党”“自绝于人民。”

文革后，清华为黄先生平反，罗征启到科委找到蒋南翔，蒋说：“好，我一定参加。黄报青是个好同志，值得我们学习。我知道他不肯喊‘打倒蒋南翔’，其实不必，我自己也喊过，小平同志也承认过自己是走资派嘛！”

《蒋南翔传》447页，写文革的只有16页。《蒋南翔纪念文集》457页，67篇文章，谈文革的只有一篇。两本书都歌颂蒋南翔的实事求是、耿直刚正、宁为玉碎，不为瓦金的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都把蒋南翔对《红旗》发表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大学而奋斗》的批判，和与迟群、谢静宜的当面交锋，视为蒋南翔铮铮铁骨的例证。而对他的妥协，他的灵活，他的自诬和认罪，他喊“打倒蒋南翔”等事，只字不提。

官书党史多讳，这是老传统，纪念文集多谀，是新常态。只有清华老五届的自印书，才会对蒋南翔的“听话出活”“双肩担”有所反思。也只有罗征启这个被双开的前清华党委副书记记下了蒋南翔的另一面。

喊打倒自己的有三种人，一种是心口如一派：他们真认为自己有罪，应该打倒。另一种是口是心非派，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罪，不应该被打倒。不过为了顺应形势，免于皮肉受苦，不得已而为之。第三种是舍生取义派，黄报青先生宁肯喊打倒黄报表，也绝不喊打倒蒋南翔。打倒自己是他向革命群众交上的宣言书——我宁肯挨打受辱，也要说真话。

在这三种人中，第二种占绝大多数。上面提到的刘小石、罗征启属于第二种，他们知道，在群众运动面前，不能硬顶，保住身体。在黄报青看来，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不说，要说，就得说真话。孰是孰非？蒋南翔给出了答案：刘、罗是对的，黄是错的。

有好多古老的格言和民间的智慧支持他们这样做：“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为俊杰”“大丈夫能屈能伸”“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同时，党的教育和社会经验也给了他们打倒自己的理由：“革命是曲折的”“党不会冤枉每个好人”“运动后期处理”“历史是人民写的”等等。在第二种人之中，邓小平是佼佼者，他给毛泽东写下的“永不翻案”纯粹是蒙混过关的假话。

要害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说假话。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正直，没有骨气？进言之，一旦这种假话合理化，正常化，会不会损坏社会的根基？林彪说，“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林杰向造反派传授经验，第一就是敢于说假话。放眼望去，十年文革，从上至下，哪有几句真话？遥想十七年，说真话的有几人有好下场？回首邓小平时代，说真话的有几个不被开除出党？再看看当下的新时代，说真话的有几个不被禁言封群。

罗征启给清华党委书记刘达打报告，提出，“现在还有人认为黄报青、刘承娴是‘叛党’‘自绝于人民’，至少文革中这一流毒没有肃清，我心里很难过。像黄报青先生这样坚定、正直、有骨气的共产党员，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吗？”刘达马上批示，要开追悼会，为黄、刘两位老师昭雪。蒋南翔来了，向黄报青先生的遗像行礼致哀。

但是，从蒋南翔到刘达，都没告诉我们，应该向黄先生学习什么？党性与人性，与气节、尊严、正直、有骨气是什么关系？从邓小平到蒋南翔，无数大人物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林彪、林杰的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百年国史】

## 文革权力之争的整体框架

谢阳秋

—

很少有哪个国家的一段历史像中国的文革那样，在本国民众中引起那么大的争论——岂止是看法相左，简直连史实本身都说法迥异。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对文革整体逻辑框架的分歧，应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比如，毛发动文革，究竟是为着“理想主义”“反修防修”，还是一场权力斗争？是反对官僚集团还是为了“家天下”？是为了普通百姓的福祉还是为个人私利？整个文革运动能否分为上层和下层“两个文革”？或者说，有没有所谓的“人民文革”？整体错则满盘皆错，细节把握得再真实，也难免得出错误的结论。

强调“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当然不错，但唯证据论也未必能够得到真相。文革本身是一场欺世盗名的大阴谋，其发动者从策划之初就设计好了，把这场会给中国人带来浩劫的灾难描绘成一场公平正义的“斗争”。如果对此没有清醒地认识，就会被发动者所制造的语境牵着鼻子走，被他们有意抛出假证据、伪证据所迷惑，得出的结论极可能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发动者为了逃避历史的谴责，还要千方百计地毁灭对其不利的证据。大凡见不得人的勾当，密谋时尽可能缩小范围——能两个人的密谋，绝不会让第三个人参加。所有的文件、讲话也尽可能不露马脚，让下面的人去猜测、领会。这样，

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就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证据留下来。如此一来，文革的这段叙事就可能会出现空白，文革整个的逻辑链条就会出现断裂和缺失。如此一来，又怎么能准确地反映出历史的真相？

记得刘仲敬说过一句话：“框架高于史料”。框架自然也是由史料构建的，只不过这些史料比那单一史料——尤其是与框架相悖的单一史料——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更多的旁证，更符合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方式，逻辑上也更能够自洽。在“框架”和某个具体史料产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就要好好检视这则史料的可信性：它的来源？有无旁证？与爆料人有无利益关系？或者是否出于某种明确目的，有意放出的伪证？

具体说到文革，也只有在一个相对宏观的历史高度上，把握文革整体的逻辑框架，借鉴“经济人”理论——人总是千方百计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去检验历史人物的动机，剔除其完全不合理的“证据”，找出事件各个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以此填补某些证据缺失的环节，从而凸显出文革的整体轮廓亦即整体的逻辑框架。

笔者在研究文革史之初，就首先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大量史料，搭建出了一个粗糙的文革整体框架，作为检视各种文革叙事的依据。今天，冒昧地抛出来，目的在于听取各位文革研究者的意见和看法，力争将其更为完善，更接近于历史真相。权作抛砖引玉之举吧！

## 二

尽管毛泽东早在50年代就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1959年更是采取第一个实际步骤，将国家主席职务交给刘少奇，但实际上并未放弃权力，只是到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才把权力交给刘少奇及“一线”。

“退居二线”不久，毛即生悔意。到了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毛退出了经济战线——大跃进搞得民不聊生，毛在经济上已无法立足——另辟蹊径，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此执掌新战线的理论制高点。

此时中共的权力格局颇有些尴尬：刘主持政治局，掌握决策；邓小平主持书记处，负责具体操作；周主持国务院，主管国民经济。决策与执行格局已初步形成。但毛死死抓住林彪主管的军队和康生执掌的秘密警察系统不放，以及用“阶

级斗争”和“反修”形成的理论话语权，对中央一线保持着潜在的威慑。

由于大跃进、反右倾和大饥荒造成的恶果太过严重，中共高层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出现重大分歧。刘、邓虽都是毛的亲信，认识上却与毛渐行渐远。一直被毛视为威胁和对手的周恩来则小心翼翼，尽量保持着对毛的尊重，在毛能容忍的框架内纠正失误。唯一另类的是，林彪无视毛给国家、民族乃至中共造成的巨大损害，利用普通百姓对中央决策暗箱操作的无知，昧着良心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大力鼓吹对毛的个人迷信。饿死了三四千万人，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不仅没有罪错，好像反而更英明了！

林彪的做法真是让“一线”左右为难——正是需要大力纠正毛的失误之时，怎么反而唱起了赞歌？但，他们又能说什么？他们原本也是毛一手提拔的亲信。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1961年在天津的一次会议上，曾向毛提出过反对林彪搞的那一套，毛虽口头上同意邓的意见，但实际上仍然纵容林的做法。在林彪的裹挟之下，“一线”也只能表面上供奉毛（毛曾气愤地说过把他当成了牌位），实际工作中悄悄地纠正毛。纠正也许并非自觉，实乃挽救经济，避免崩溃所不得不为。于是乎，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奇异局面：

毛犯了大错（对党）或曰大罪（对百姓），却依然高高在上，更加神圣；林指鹿为马，做着毛想做而不方便做的事，深得毛的欢心；刘、邓、周、陈默默“拉套”，尽量避免触动毛的“红线”；周恩来倒是舒了一口气，他发现毛之前对自己的怨气，已经转移到了刘、邓身上……

这是一个并不稳定的格局。“一线”越来越不能忍受毛在具体工作中的横加干涉——一会儿说文艺界是“裴多菲俱乐部”，一会儿骂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不在其位、不承担责任，却一直在后面指手画脚。而毛也有日益迫近危机——“九大”还要拖到何时？按照党章，早在1961年就应该召开“九大”；党章规定一年一次的中央全会，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算，已经数年没有开过了。

《林彪日记》披露：“……刘邓提议，61年8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64年5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

毛当年为什么如此害怕按时召开“九大”呢？文革中康生曾吐露了实情：“如果按时召开‘九大’，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这些王八蛋就会选入中央……”

林彪在著名的“518讲话”中更是剑有所指：“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这个“人家”是谁？当然不是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恰恰是当时在座或不在座的中共大员。

如若文革前召开“九大”，十有八九毛将丧失“主席”头衔，就任“名誉主席”。这样，“退居二线”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固化，他也将彻底失去对中共的控制。刘少奇就任主席后，会不会像赫鲁晓夫那样做“秘密报告”？在毛泽东的眼里，刘的忠诚已殊为可疑。

就在刘、邓为毛的问题困扰——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之际，毛则在顺从党的安排和拼死一搏之间挣扎。毛不是没有考虑风险，包括失败的风险；不是没有考虑他这一搏，会给国家、人民包括中共带来何等严重的灾难；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大跃进、大饥荒的罪行太大了，超过了古今中外所有的皇帝、国王、总统或是主席。他不能，也不敢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

### 三

明了和理解了毛在文革前的处境、他面临的选择之后，对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为了重返权力中心，他在无法通过党代会等正常程序的情况下，采用了非法手段——依靠林彪及军队发动隐形政变，造成顺者昌、逆者亡的政治大环境；依靠江青和“中央文革”名为“发动群众”，实则运动群众；以打倒党中央，重塑新中央为目的，发动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

有些国外的研究者不解：毛为什么会用文革粉碎自己担任主席的党？这不正说明了毛的伟大？至少也说明了他的理想主义，不能容许革命队伍中不够“纯洁”的现象。他们完全被假象所迷惑。其实，毛的行为可用鲁迅的一句话解释：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从来没有爱惜过。文革中毛承认自己此前已经“大权旁落”。换言之，他感到自己已经不能控制这个党，这个党已经“不是自己的东西”了。既然已经不属于自己，粉碎它又有何惜？粉碎后重建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奴才党，岂不更好？文革的整个进程也雄辩地诠释了这个逻辑。

为个人权力，毛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点，轻率地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默许、怂恿了人们的私欲大膨胀。各色魔鬼一经放出，立刻肆虐大地，再收回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夺权”助长了人们的政治野心，谋求在“新政权”中的权力



和地位，又引发了旷时日久的纷争，以致不惜诉诸武力。一时间，华夏大地战火纷飞，枪炮轰鸣。国民经济、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等到“全国山河一片红”，各地都成立了“红色新政权”（政权都换了，不是改变又是什么）之后，用“抓516”的方式，镇压对新政权造成威胁的“造反派”；用“上山下乡”将动乱隐患——数百万学生统统赶到农村或部队农场去“战天斗地”。以精疲力竭的体力劳动消耗这些曾经的“革命小将”过剩的精力。

然而，文革新贵们屁股下的“交椅”还没有暖热，一轮新的权力之争又悄然而至。

#### 四

毛、林名为“革命”实为“窃国”成功之后，如何重新分配刘邓等一大批下台干部留下来的“权力真空”，又成为新的斗争焦点。文革本是毛林合作的产物，二者缺一不可。毛可以不靠江青，不靠周恩来（周甚至是原定目标之一），但唯独不能不靠林彪。没有林彪和军队的威慑，毛怎么可能轻易地否决中央常委的多数意见？在林彪明确介入之前，他甚至不敢直言否决彭真的《二月提纲》。然而，打倒刘少奇、重返权力中心的毛，此时却不愿意论功行赏，把胜利的“蛋糕”分给林彪；或者说他认为林彪实际分得的“蛋糕”已经太大，对自己形成了潜在的威胁。

原来，在毛和中央文革大力清洗刘、邓包括周的旧部之时，林彪却不动声色在军内排斥异己。到了“九大”前后，不仅军委办事组几成清一色的“林家军”，而且各省、各部委的“大员”也多是军队干部，俨然已成可以左右政局的强大力量。“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令毛老愁乍消，又添新愁。

尤其让毛为难的是，林是靠吹捧毛蹿红的，要削弱林则只能从降温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入手。毛曾在“九大”文件上删掉发明权属于林彪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一般人都认为是毛的“谦虚”，不大在意。从后来的发展看，实乃毛削弱林的提前布局。

毛刘相争渐渐演化为毛林暗斗，你一拳，我一脚，风波迭起。

首先，黄永胜就任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长之后，向毛打报告，请示部队调动不再经由中央文革。江青获悉后大怒，停了黄永胜参加中央碰头会的资格，还

不准他计划好的出国访问。尽管在周恩来的斡旋下，双方得以和解。但嫌隙既生，就难以消除。

随后，林彪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把毛发动的文革比肩意大利文艺复兴。原本是为了拍毛的马屁，岂料被江青揪住不放，声言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怎能和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革相比？林的讲话应该批判。此事颇为诡异——难道他们不是都多次声称为“同一战壕的战友”吗？江为何会如此“不顾大局”？

“九大”报告，毛否定了陈伯达按照林彪思路撰写的讲稿，自然也会引起林彪不满。有人美化林彪，将此说成是林要发展生产和毛要“继续革命”的路线之争。笔者则认为，这不过是林彪和陈伯达为了巩固自己在文革中所获取的成果而已。深知文革内情的林、陈太明白了，打着漂亮旗号的文革，绝无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历史进步，因此希望能以发展生产力来掩盖其非正义性。如果林彪真的关心发展生产，就不会有在“七千人大会”上独树一帜的讲话，不会有1966年11月份对“工交座谈会”各与会者的严厉批判，甚至也可以说，绝不会帮助毛来发动这场祸国殃民的文革。

“九大”选举，林彪及手下大将不投江青的票——2000多大会代表选中央委员，江青少了6票；200多中委选政治局委员，江青还是少了6票。江青、康生一再要“追查”，被毛、周压下。也有说法是毛虽口头上反对，最终还是默许了江、康去暗中进行了调查。这件事也彰显了林彪与江青两大集团的行为，均如此之下作。境界和格局如此之低，焉能有治国安邦之大胸怀？

紧接着就发生了李必达事件。李是黄永胜的秘书，因受了黄夫人，同时也是“黄办”主任项辉芳的批评，自认为没有了前途，遂将黄与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私下里议论和批评江青的话，秘密写信向江青告密。江将李的信转送毛。最初，叶群、黄永胜十分紧张。后看毛没有责怪，也没影响他们升迁政治局委员，随后就秘密抓捕了李必达，用专机送黄的广州“根据地”关押。

林系几员大将的所作所为，毛是看在眼里，气在心头。虽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一定十分恼怒——“九大”刚刚“胜利”，你们就不顾大局，挑动纷争。恼怒之余，毛也一报还一报。当着林彪的面，亲自交待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这些王八蛋的东西”统统摘下来！在场的林彪会有何种感受？

“九大”后，江青“召见”军队新晋升的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的几员大将，以上级对下级的口吻训话。黄、吴、李、邱在林彪暗示下，集体去毛处告状……

1970年7月政治局讨论“八一社论”，张春桥一改传统提法：解放军是毛“亲自缔造和领导”之后，加上“毛主席和”四个字。这样，传统提法中的解放军是由毛“缔造和领导”“林直接指挥”，变成了毛不仅要“亲自缔造和领导”之外，还要和林一起去“直接指挥”。此举遭到陈伯达反对，引起一阵风波。毛虽然表面大度，称可以改回传统提法，却始终不肯亲手将“毛主席和”四个字删去，最后还得由汪东兴代笔。

除上述暗地里的钩心斗角之外，还有几件明面上的事情：

#### 1. “林副主席一号命令”

为开好“九大”，凝聚人心，中共领导层有意制造了中苏边界“珍宝岛”之战。但到了1969年秋天，就深感苏联的威胁——苏军坦克若从中蒙边界出击，一昼夜即可抵达北京。毛不得不号召“备战”，并早早躲到了武汉；林彪职责所在，视察了“三北”防线后，也躲到了苏州。为防止苏联借“和谈”用兵，林下达了全军进入紧急状态的命令（即“紧急指示”）。林并没有事先请示毛并得毛批准，这是疏忽？还是有意为之？须知，此前每调动一个排林都要请示毛。

副总长阎仲川将林的“紧急指示”，自作主张改为“林副主席一号命令”，无意中大大刺激了毛那根敏感的神经——未经批准，林就擅自命令全军“大动干戈”，将毛军委主席的权威置于何地？假如有一天毛林失和，林岂不是可以凭此轻而易举地剥夺毛的权力？尽管林彪在事后紧急向毛请示，做了补救，但疑心重重的毛岂能轻易化解？

#### 2. 毛试图隔代指定“接班人”

1970年4月，毛携张春桥到苏州看望林彪，向林彪推荐“小张（春桥）”，有隔代指定“接班人”之意。毛的突然袭击，让林彪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后来还是借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的话题，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应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试探：毛从中看到林并不总是像他口称的那样“一

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也看到了毛已对其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在毛林之争中，有些人对此做了误读：认为林彪从中看到了毛要“以张代林”。事实上，此时的毛即使为了维护“文革成果”，也不可能用一个既无资历又无实力的“小记者”取代强有力的军人。更大的可能倒是为林“隔代指定接班人”，以保证在林之后的政权仍然掌握在毛派手里。

笔者一向认为，与林闹翻，是毛在战略上的最大失误，是毛作为权术大师最大的败笔。或许是拿掉刘少奇的过程太过容易，让他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真的无所不能。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威望”和实力，也低估了林彪在震慑和压制“走资派”，维护文革成果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913”后，大批的“走资派”——文革的受害者、反对者——经周恩来不动声色地运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让毛及文革派十分头痛。不得不一次次发动“反复辟”的运动。但因缺少了林彪集团强有力的支持，或虎头蛇尾，如“批林批孔”；或中途夭折，如“评水浒”。

总之，毛、林这场内讧，大大削弱了极左派的力量，戳穿了为文革编造的各种神话，致使文革理论的破产，也最终导致了对文革的彻底颠覆。

## 五

文革派最核心的圈子显然已经接到了暗示——它可能直接来自毛，也可能间接来自江青。1970年8月，在讨论宪法修改的政治局会议上，爆发了文革派张春桥与文革“军人派”吴法宪的激烈冲突：张提议删去发明权专属林彪的一些话，遭到吴法宪强烈的反对。两人争执不下，会议暂停。

吴法宪立即向林彪做了汇报。林当然知道对方的来头，但事关自己接班人地位，决不能退让。刘少奇正是在毛面前节节退让，才最终被拿下整死。林彪岂肯做刘少奇第二？在林支持下，吴法宪等人做了充足的“功课”，准备在下次会上与张“决一雌雄”。岂料，在接下来的会上，张春桥全面退却，不再与吴纠缠。

这让林彪颇感失落。犹如准备一拳打过去便置对方于死地的拳击手，攒足了全身的劲儿，却打了一个空！目标突然消失了！是江？是毛？还是张春桥自己做的这个选择？恐怕只能是历史之谜了。

接下来就要到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了，有关宪法的修改还是一塌糊涂。

攒足了劲儿的一拳终究是要打出去的，林彪把它带上了庐山。资料披露，这一拳究竟是打还是不打？林也颇为踌躇。甚至赴会场开会上车前，还在和叶群商量。

自文革发动以来，林彪已经几次成功迫使毛做了并不十分情愿的事，如罗瑞卿，又如贺龙、邓小平、杨成武，这次轮到张春桥，毛就够接受吗？在实力强大的“接班人”和“小记者”之间，精明的毛，能够选择“小记者”？既然罗瑞卿可以为林彪放弃，贺龙可以为林彪放弃，为什么张春桥就不能为他林彪放弃呢？

林彪决心孤注一掷，开幕式前突然提出要在开幕式上讲话。毛问：讲什么？林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听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另据陈晓农编注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一书：在庐山全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谈话，周恩来及其他人，都在另一个房间等待（叶永烈在此加注：又据别人回忆，叶群当时守在走廊上，以防“十一楼”闯进去。“十一楼”即江青）。毛和林单独谈话后，大会开了。

从以上两段资料看，笔者竟和高文谦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高认为因为得到了毛的首肯，所以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不能算“突然袭击”，而笔者却认为恰恰相反。

理由是林彪选择要求讲话的时机，大约是在开幕式前个把小时以内。这么仓促的时间，毛怎么可能反应过来？从毛当时就把责任推到江青身上，既像是在表白和洗刷自己，又像是猝不及防、情急之下的反应。另外，从叶群守在走廊上防止江青闯进去这一点看，林、叶是有备而来，事先经过了周密与精心的策划。

笔者对毛林发动文革，祸国殃民深恶痛绝，毛的罪更十倍、数十倍于林，但这并不应该影响对事实本身的剖析。

前一晚的常委会，林为什么不提出要讲话？这个讲话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产物。显然，是林不愿意将自己的计划提前暴露出来，给对方以准备和商量的时间。假如常委会认定林彪讲话不妥，林将何以应对？而在会议即将开始之时，林突然要讲话，毛还能有什么反应？当场拒绝“亲密战友”的要求？用什么理由拒绝？党的副主席难道想在会议上讲讲话都不行？这岂不是当场就撕破了脸皮？还原一

下当时的场景，林更像是主动、有备；毛则显得仓促、被动。

林确实按毛的要求：不点名，指出了党内有一股否定毛是“天才”的风。借毛打毛，也是这位从军事家转为政治家的拿手好戏。当此时，林所营造的对毛“无限忠诚、无限崇拜”的个人迷信已达到巅峰，毛“降温”的企图刚一露头，便遭到林系人马的迎头痛击。林的讲话，无异于在庐山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把与会代表炸得晕头转向。

紧接着，吴法宪提出学习和讨论“林副主席讲话”，改变了会议的议程。叶群布置手下亲信在各小组会上同时发难，营造了同仇敌忾的义愤。了解一点底细的，在发言中慷慨激昂，要揪出“反毛、反林”分子；不明就里的四处打听林彪讲话中的目标人物姓啥名谁。“知情者”上个厕所，都有人尾随、打听；“知情者”的房间，晚上访客更是川流不息，几成“自由市场”。

虽不能从叶群等处得到可靠消息，却总算听出了一些门道的许世友、韩先楚上将兴奋不已。这两位在文革中被张春桥支持的造反派整得焦头烂额的大军区司令，总算等到了可以“出一口气”的机会。许对韩说：那个“鳄鱼眼”的寿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韩先楚马上说：我也要给他补一枪！（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页120）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始作俑者”的张春桥想必早已魂飞魄散：毛会不会在压力之下，抛出他做“替罪羊”？毕竟，王、关、戚之劫犹在眼前。谁能保证三年后的今天，他张春桥不会重蹈覆辙？

事情反映到了毛泽东处。这位近于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似乎还不知道会场上发生了什么。被江青带来的张春桥、姚文元匍匐在地，一人抱着毛一条腿痛哭流涕，把毛的裤子都弄湿了一大片。（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页132）

毛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分析与判断：假如这次在林和林裹挟下的力量下退让，林会得寸进尺，下一步就会搞到江青头上，自己将如何应对？听之任之，岂不又成了刘少奇第二，亲信被逐一“歼灭”？直到成了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不就又成了类似文革之前被刘少奇们供奉起来的“牌位”？

毛决不会允许整刘少奇时的“剥笋”战术用到自己身上。何况，此一时彼一时，毛当初在罗、贺等人问题上的迁就，是因为刘少奇尚未整倒，林的支持必不可少。如今，毛的目的早已达到，为什么还要受林彪要挟？

毛立即做出反应：停止讨论林彪讲话。一边体会几天，一边紧锣密鼓，责令陈伯达等人“检讨”——避实（林）就虚（陈），原本就是“伟大领袖”的拿手好戏。很快，毛的《我的一点意见》出笼，陈伯达立陷四面楚歌之中。

毛再次利用林彪营造出来的“个人迷信”来打击林彪的力量！这真是一出好戏：林利用毛打毛，毛也在利用林来打林。阴谋家碰上了阴谋家，正如《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所形容的：纳粹独裁者遇上了苏维埃暴君，真可谓棋逢对手了！

庐山会议，毛泽东棋高一着，扭转了局势，压制了林彪派系的气焰。然毛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非但没有化解，反而变得不可调和。毛林均是那种不善妥协、一旦冲突就会死硬到底的性格。庐山分道扬镳，就只有一条道儿走到黑了！

会后，毛在全国开展“批修（陈）整风”，军队要“反骄破满”，将陈伯达谓之“刘少奇一类骗子”。“内部”却对林彪派系不断施压，责令其嫡系亲信“四大金刚”包括叶群“检讨”。毛一改文革初期对叶群的“亲切”，在叶的“检讨”上作批示，恶语连连，一点也不给林彪面子。林则循“文的不行，武的行”，加紧策划包括使用武力的应对措施，一场恶斗势在难免。

从这次庐山会议起，毛恐怕已下了与林破裂的决心，也让林彪再次尝到“狡兔尽，走狗烹”，被毛过河拆桥的滋味——这是不久前，被林参与整垮的刘邓诸人也刚刚尝过的。林对毛的怨恨日渐增长。但总的来说，林有犹豫，有纠结，不像毛那样决绝。

林尽管拒绝按毛的安排去会见“老朋友”斯诺，在会见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和1971年“五一”天安门焰火晚会时给毛甩过脸子，但也对毛有所幻想，曾多次要求与毛见面一谈，甚至给毛写信，（实质上是）以保文革成果20年为条件，换取毛停止整肃他手下“四大金刚”和自己一家。只不过由于叶群坚决反对，此信没有送毛，“913事件”之后才从毛家湾抄出。

这封信反映出了林彪的真实思想，其中不乏比毛清醒得多的见地：文革本身就是一场欺世盗名的军事政变，绝对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如果没有林系军人集团的强力支撑，其“成果”很快就会“付之东流”。这一点，林看到了；而自以为自己神力无边、无所不能的毛却恰恰没有看到，或者是即使看到，也要权力任性，不顾一切地斗下去。

毛正像他自己后来一再宣称的，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召开“华

北会议”批陈及“四大金刚”；背后下手，通过“南巡”向地方大员“吹风”，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解决林彪问题“交底”和“统一意见”。林则暗中支持和默许其子林立果组织力量，制定“上、中、下三策”，紧锣密鼓地实施刺杀毛的计划。

毛毕竟是老奸巨猾。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故布疑阵，出人意料化解了林立果的谋杀计划。当然，也有人怀疑毛在林家布有“眼线”，令其一举一动尽在毛的掌控之中。只不过目前尚未有确切证据，纯属猜测。毛林恶斗这出戏的高潮是毛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叶群怀疑谋杀阴谋败露，说服林彪仓皇出逃，最终命丧荒漠，一切计划戛然而止。

## 六

在毛林反目成仇、你死我活的恶斗中，周恩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913”之后，周的获益最大。按照犯罪学的原理，获益最大者往往就是罪犯——难道是周暗中挑动了毛林内讧？但直到如今也没有任何证据；相反，证明他竭力缓和毛林纷争的例子倒很多。“欲擒故纵”？还是高手的“无影脚”？至少目前还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毛刘、毛林、毛邓和毛周关系中，以毛周关系最为疏远。可为何刘、林、邓全被毛打倒，周却能数十年屹立不倒？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在毛林之争中，周恩来同样有一个“选边站”的难题。站在林一边，并不符合周的利益：且不说胜算较小，即使侥幸取胜，周也只能是干活拉套。林不仅有自己的班底，更有一个生龙活虎一般的儿子做“接班人”，哪还能容周恩来染指？林及其死党可能会对周很尊重，比在毛手下宽松得多，但，周绝难施展抱负。

站毛一边就不同了：助毛灭林，在周看来其实就是助毛自残。让毛与其在军中的嫡系亲信之间发生一场你死我活的权斗，不仅败者全军覆没；胜者也“歼敌一千，自伤八百”，实力骤减。再加上毛并无子嗣“接班”，一旦毛死，剩下的除了老婆就是“秀才”，岂是周的对手？

周在党内军内树大根深，十大元帅，有八个曾是他的学生或部属。毛活着，周顾忌毛的猜疑，不敢与这些人过多来往。一旦毛死，谁敢说周不会一改在毛手下“小媳妇”的角色，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

当然，毛也绝不会看不到这点，他也绝不允许周如愿以偿。“913”之后，



周主持工作，大批林彪的极“左”。名为批林，实批文革。很快就受到了文革派大将张春桥的挑战。毛再次支持张，周不得不知难而退，转批林彪“极右”。但据周的秘书透露：周曾在私下里反诘：明明是“极左”嘛，怎么会是“极右”？

## 七

“913”之后，毛的思路其实也很简单——尽快觅色和安排一个信得过的新“接班人”，以保他百年之后文革成果能够得以保全。毛不相信周会真心诚意拥护文革，若从文革理念与共同利害出发，江青无疑最为理想。但江青“成也身份，败也身份”，江青固然可以利用她的特殊身份撒泼、耍赖，令别人奈何不得；但也让毛无法张口指定为“接班人”。最理想的，莫过于让周恩来出面举荐——像他当年看出毛的心意，主动推荐林彪那样——而毛则半推半就“被迫接受”。

资料显示，1972年2月12日，毛泽东休克苏醒后，演出了一场病中交权的把戏。身在现场的李医生描绘当时的场景：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立即插话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

毛摇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周知道毛最想得到的回答是：“我建议毛主席生病期间，由江青同志代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我将像辅佐主席一样，辅佐江青同志。”

周如果能这么说，就是满分的答卷。毛恐怕还得再谦让一下：“就让江青同志当个副主席，或者上传下达的联络员吧。”然后，把周的建议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是周恩来推荐江青接班，不是毛要搞家天下。而周这样做，可换取全身而退。（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

应该说，这的确是一个相当高明的计划：一则可以让毛避嫌“私相授受”；二则利用周在党内军内的巨大影响，抑制反对派的呼声；三则把周拉下水，替毛承担恶名；一旦毛离世，周掌权，他也不便“出尔反尔”，对江青下手。

然而，这一次毛却打错了算盘。周虽然在文革中甘做毛的奴仆，替毛顶下各种恶名；但这次却守住了他的底线——不能让毛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

周心里明白：当时如果真的接了权，很快就有可能被以“篡权”为由打倒。

以他的精明，岂能跳这个陷阱？于是选择了第三个方案：拖。一直拖到毛恢复了健康，周拜见毛：“主席，大权还在你手里！”把球又打了回去。

这次考验，周得分 50，不及格。日后绵绵不断地针对他的措施和运动，均由此而生：发现周患癌症后“保密”一年零八个月，不允许做任何治疗。生生把周拖到癌症全面扩散、无异于判了“死缓”，才假惺惺允许周住院治疗。毛的歹毒创造了世界纪录：即使是恶魔希特勒，也绝不会对手下——况且还是为他出了如此大力的手下如此绝情。

## 八

眼见周“不咬弦”，毛不得不另觅他法。在中共“十大”，毛破格提拔对江青唯命是从的上海造反派头子王洪文，使其成为毛、周之后的“第三号”人物。提拔那些对大跃进、大饥荒前后党内高层分歧一无所知的普通农民、工人，如陈永贵、吴桂贤等进入政治局；大量提拔文革中涌现出来的造反派，硬塞进各省和中央各部……然而，这些人“打打杀杀”可以，踏踏实实抓经济就强其所难了。

为让文革后的经济有所起色，同时制约乃至最终取代周恩来，毛重新起用了邓小平。毛深知邓的能力，没把握的只是他是否忠诚。1973 年底，毛抓住周与基辛格谈判中出现的“纰漏”——或许是有意设置的陷阱——指令政治局召开“帮周会议”，特意“点将”让邓出席。邓明白毛的心思，发言中点明了毛想说而不便说的话，一下子便俘获了毛心。此后，邓迅速蹿升：政治局委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949 年后，毛从未让一个人同时兼有党、政、军跨界实职：林彪主持军委工作，虽挂有“副总理”虚衔，但从不参与政府工作；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主持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但不容许他们染指军队。这一次，邓小平破天荒地同时参与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足见毛对其期望之高，信任之深。

应该说，毛的这一手也是相当的老辣，无疑又是一次对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掺沙子”。然令人不解的是，江青似乎从未参透毛的战略深意——不知毛为何不对她做些暗示——包括她的头号马仔，应该说是毛搞文革最为了解的张春桥，思路也都局限于低层次的权力分配：把邓视为搞文革“成果”的“摘桃派”，不仅未能借邓复出之机与其修好关系，而是处处寻衅挑刺，意在气势上压倒邓小平。

江青未能领悟的却很快被邓小平悟到了——原来自己在毛的棋盘上，只不过是用来维护江、张“文革派”，挟制周、叶“务实派”的一枚棋子！邓也不是凡人，利用毛“身边无人”，不得不倚重他之机，迫使毛亲自出面批评江、张“文革派”，并借毛的“大旗”狠狠打压了他们的气焰。江、周矛盾很快演化为江、邓冲突，毛泽东刻意安排的一招妙棋很快就破局、泡汤。

客观地说，毛以邓一人同时挟制周、叶二人，确实是一招高棋，但难度极大，成功的概率原本就很低。邓小平的治国理念和个人感情，原本就与周、叶等务实派接近，让他追随毛泽东尚可，企图让他沦为江青的“马仔”——这位张狂无比，目空一切的“江皇后”就有些勉为其难了。

## 九

邓向周、叶靠拢的速度显然让毛也感到了意外，却正是江青等人一再相逼——尤其是在“风庆轮”问题上——的结果。邓一面借毛倚重，大力整顿从文革开始以来已经荒废已久的各项规章制度，让经济有了“立竿见影”的起色；一面借毛对“教条主义”的反感——这是毛30年代受排挤的主因——促毛压制了“文革派”用“批经验主义”来削弱周、邓、叶等老资格领导人的企图。

恰在此时，江青“红都女皇”事发。有资料说是朱德看到此书后，气愤不过，将书送给了毛泽东，也有说是周恩来暗中运作的结果。总之，毛读后勃然大怒，冲动之下，亲自写下批示，要与江“分道扬镳”“赶出政治局”。毛的批示被老到的周压下一——他太熟悉毛江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微妙关系，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火烧身。轻率地按毛的指示办事，当时虽名正言顺，但事后遭到报复并非没有先例，如傅崇碧等人。

然而，文革毕竟已进行了近十年，参与者都在反思和总结经验。老干部在文革之初，恪守党纪，不敢泄露党内机密，等于放弃自卫的武器。而文革派则没有任何顾忌与底线，常常根据需要把机密有意泄露给“造反派”，把老干部整得焦头烂额，甚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他们汲取了教训，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通过子女、部属等各类关系，迅速把江青的丑行捅向社会。

1975年的“七、八、九三个月”，有关江青和《红都女皇》，毛“分道扬镳”“赶出政治局”的批示，传遍了大江南北。连延安时期的“约法三章”，以

及江在30年代上海做三流明星时不检点丑事都被翻了出来了。舆情汹汹，对江青和文革派造成了致命的损害。此举可以说奠定了几个月后的“四五运动”以及更往后的“粉碎四人帮”强大的民意基础。

从1971年的“913事件”文革初露颓势，至1976年的“四五运动”，毛对局势的掌控也越来越力不从心。因为担忧局势更加恶化，毛甚至不敢贸然进行大的人事变动。唯一的一次“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甚至请出了被自己多年有意边缘化、也已多年不问政事的朱德压阵，加上周恩来、叶剑英和邓小平合力协助，才勉强得以执行。周恩来去世，毛忌惮党内强大的反对意见，不敢让其最为青睐的张春桥接替总理，生怕闹出乱子。

怕出乱子还是出了乱子。从1976年3月中下旬起，群众自发起来抗议当局压制对周恩来的悼念及含沙射影地攻击。从“南京事件”到“四五运动”，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抨击四人帮的声势越来越大，越来越激烈。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违背当局意志、完全群众自发的大规模抗议运动。毛心知肚明，其矛头正是对着自己及羽翼下的亲信，他无情地下令镇压。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全国一直处于一种沉闷、压抑和紧张的氛围中。毛深知文革已经人心丧尽，军队实际控制权已经不再。选择一个可靠又有实力的接班人已成泡影。将来怎么办？身后恐怕是血雨腥风——但此时此刻，只能指望生前不被推翻，哪管他死后洪水滔天。

实际控制着军队的将帅们都在虎视眈眈，等着毛辞世。稍有些政治敏感的人想必都能看清这个局势。比如：

许世友的儿子，时任北京军区某部团长在一封密信中透露：许世友对他说，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

文革新贵纪登奎的儿子，也对河南省委一位在京治病的干部说：现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争。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是因为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

当然，也有看不明白的，或对江青抱有幻想的：如乔冠华、章含之夫妇，庄

则栋、张铁生之流。或脚踏两只船，搞政治投机的，如南京军区司令丁盛。

## 十

文革十年，毛先是拉林、周倒刘、邓；继而拉周倒林；再往后又试图多次倒周。“造反派”用到时赞誉有加；不用时一脚踢开，甚至抓进大牢。“红卫兵”“革命小将”忽而捧到天上，称为“小太阳”；忽而踩在脚下，有的定性“反革命”，沦为阶下之囚。到末了，不论何派，一律扫地出门，赶进“广阔天地”。

十年中，除了江青一人被林彪从9级提为5级外，上亿人没涨过一分钱工资，没盖过一幢职工宿舍，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艰难。哲人说：尽管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全部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从1968年或更早些时间，就不断有觉醒，有思考；到了1971年“913”，文革神话在全国人民面前露了馅；再到1976年“四五运动”，已经是天怒人怨，毛再也无法把骗人的把戏演下去了。

对于这点，毛其实心里非常明白。他对张玉凤说过：“我死后，可能不出一二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

毛的弥留之际，全体政治局委员依次上前与毛握手。叶剑英没想到毛第二次唤他到病榻前，毛的嘴囁动着，却什么也没能说出来。他想说什么？请求宽恕？（他几个月前以“身体有病”为由，刚刚解除了叶的军权）；抑或央求手下留情？（看在孤儿寡母的份上？）随着这位大独裁者的离世，这一切都成了历史之谜。

“10月的春雷”极其自然，水到渠成。“四人帮”被抓，也是他们作恶多端的必然结果，是他们不可避免的命运。这绝非占卜，而是情势使然，力量的对比使然。毛决意发动文革，重返权力中心，希冀以高压手段钳口，永远掩盖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历史罪恶。他几乎就要成功了。试想，如果他能与林彪达成妥协，林依靠军人强力集团再替他遮掩数十年，这滔天大罪或许就真的没人知道，湮灭在繁杂的历史尘埃之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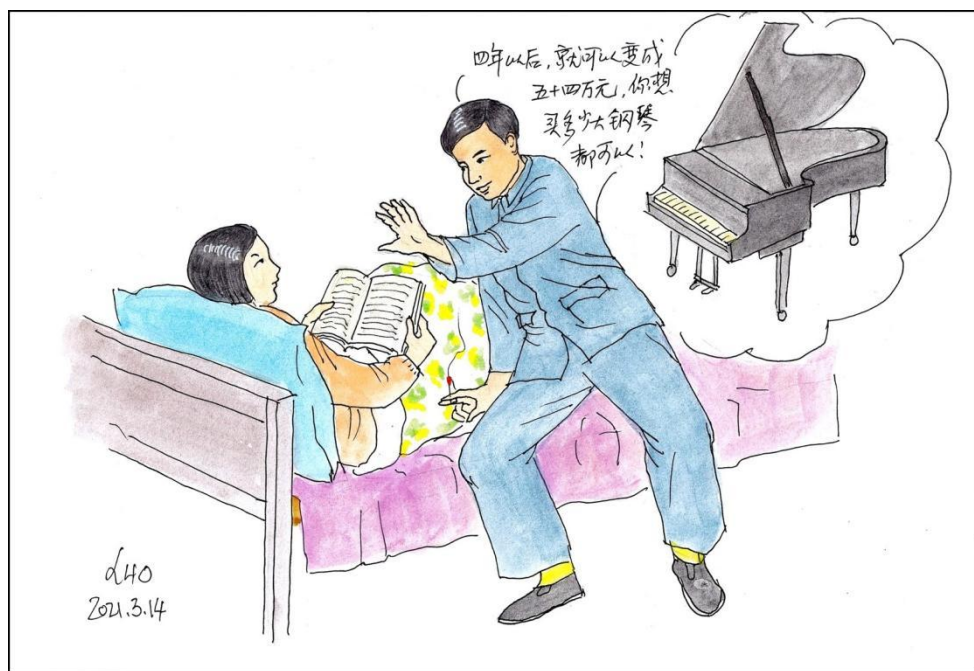
然而，天网恢恢。从林彪事件撕开一角，到邓的改革开放全面翻盘，毛苦心且精心营造的文革神话轰然倒塌。毛的诸多历史罪恶也就越来越多地摆上了桌面，被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所知晓。可以相信，尽管目前中共似乎还需要毛的偶像，但彻底揭露毛，清算毛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百年国史】

## 画说我的一生 (27)

——秀才下海，三年不成（1983-1985）

刘海鸥



君子兰是老宋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他八十年代的一大白日梦。那些年“下海”是个时髦的事，弃工从商，弃农从商，弃文从商，几乎要形成全民总动员的态势。老宋也跃跃欲试。1983年初的一天，他很晚才从徐老师家回来，坐在我的床边兴冲冲地谈起他刚在老徐家形成的一个伟大设想——一种君子兰。八十年代初在东北兴起一股君子兰热，到老宋在老徐家听说的时候，东北那边君子兰都卖疯了，一两万元一棵成兰！老徐已经买了好几棵，在阳台上开辟了一个花房，就等长大了出手。老徐是体院院长的儿子，也是学院的老师，很有经济头脑，有各种各样的消息来源和赚钱的路子。他鼓动老宋和老翟（老宋的好友，生化教研室的老师）一起种君子兰，一大顿忽悠把俩人说得得意乱神迷，当下就决定干一票。

老宋兴致勃勃地给我描绘了一幅前途美景——别看现在几百块钱一棵小苗，买10颗，几年以后就结籽了，一棵花可结若干籽，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几年以后，不出四年吧，就可以挣到手54万元（不知怎么算出的，有零有整），你不是想要大钢琴吗？买几台都没问题。





我将信将疑地听着，花花草草能成气候？脑子里毫无概念。既然他想干，就试试吧。问题是本钱呢？我们俩人一分钱积蓄都没有，每月总要拉十几块钱的亏空，厚着脸皮跟妈妈借，发了工资先还钱，到了月底还是差那十几元。

要买花苗只能借钱，不知费了多少口舌，老宋说动了家人掏出腰包，妈妈、刘元、贵阳的兄弟姐妹各凑出一笔钱，老翟也设法借了一些钱，东拼西凑了3000元，他们今生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1983年1月，老宋穿着一件借来的军大衣，怀揣一个铝制饭盒，里面装着那笔“天大”的款项，向冰天雪地的东北鞍山出发。一个星期后回来了，从怀里掏出还是那个饭盒，3000元变成了十几棵小拇指长的小苗，两家人的全部希望。这之后老宋又两次借钱去鞍山，每棵小苗都是花二三百，还有一次花了1400元买了一棵大点的用来尽早开花结籽，自产小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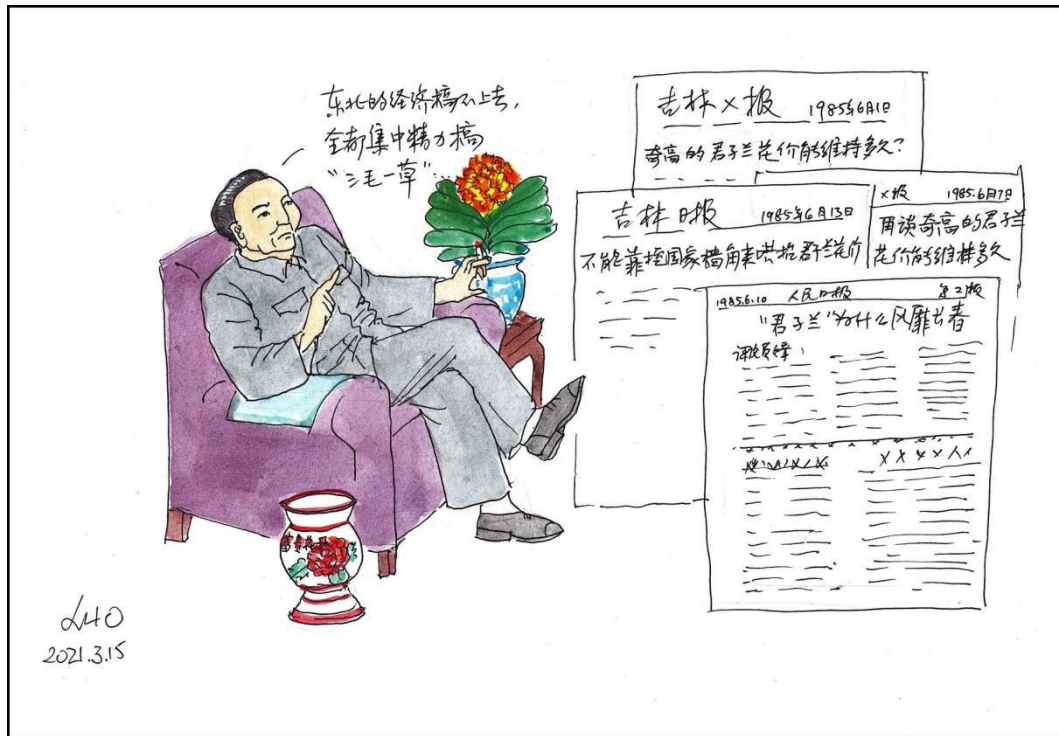


苗多了，我们狭小的宿舍养不下了，就在妈妈家的西跨院盖了一个小暖房，为了借用西墙，把西墙根爸爸种的一棵香椿树给移走了，栽到大北窑他新居的窗前，结果死了，我真觉得对不起爸爸。正是冬天，老宋自己在体院照顾另一批小苗，央求妈妈帮他看好暖房里的炉火。妈妈在管理炉火方面非常笨拙，家里的取暖炉子几乎天天都灭，为了让暖房的炉子永远发热，她只好半夜三更起来添煤。为了子孙的幸福，妈妈真是无私地付出了许多。

一年后小苗长大了，开花结籽了，妈妈家的花房也放不下了。老宋和老翟在体院附近的村子租了一个农家院，挖了一个半截入土的大花窖，盖上了玻璃屋顶，两个人轮流住在那里看管花苗。那时我已经在中央戏剧学院工作，带着儿子住在妈妈家，可怜的又佳随着老宋每晚在村子里居住。



二人精心栽培之下，君子兰已经发展到上百棵，品种繁多，“垂笑”“黄技师”“大胜利”……蓬蓬勃勃，长势喜人，一种叫做“和尚头”的品种叶子宽度比老宋的手掌还宽一个指头（叶子越宽越名贵）。有人出十万元要买下所有花苗，被他们拒绝了，二人喜滋滋地憧憬着触手可及的未来。



1985年大舅从香港来北京看望妈妈，聊起君子兰的事，当会计师和商界人士交道多年的大舅听了马上警告说，生意不是这样做的，一定要有进有出，千万不可积压产品，商界风云万变，一不小心就会血本无归。老宋哪里肯听，小打小闹的买卖不做，等所有的兰花养大了，几千元一棵出手，马上就是万元户几十万元户了。那时的万元户就如我们现在所说的亿元户一样高不可攀。

大舅的话不幸而言中。全国上下君子兰热已经炒到了沸腾的地步，有的品种可卖十几万，几十万，最高甚至达到六十万，甚至有一个港商专程赴长春要用一辆皇冠轿车换一棵名种君子兰。马克思的那句话“（资本）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成为现实，由君子兰引发的腐败案件：公款送礼，收受贿赂，偷税漏税，和抢劫杀人案件与日俱增，引起了上面的注意——这是什么鬼，竟然能干扰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治安？在1985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批评说东北的经济搞不上去，全都集中精力搞“三毛一草”（三毛是指三种动物的毛皮，草就是君子兰）。《人民日报》紧跟邓小平的指示，在6月10日发了评论员文章《君子兰为何风靡长春？》，说“君子兰除了观赏没有其他用途”，“君子兰买卖是‘虚业’”，“君子兰市场的繁荣是靠挖国家墙角获得的”，“是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教导人们“四化建设要我们多干实事”。





上边一发话，君子兰热在一夜之间降到冰点。老宋们意识到形势不好，想马上出手，但是高贵的君子兰已经身价扫地，没有人稀罕了。他们只好自己到农贸市场上去卖，两个人趁没课时偷偷地轮流去，蹲在地上，前面摆几棵小苗，几毛钱一棵都没人买，还要防着市场管理员来收钱。



最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买主，就是当初想出十万元的那个，现在几千元把整个花房的君子兰连锅端走。商人还是有商人眼光的——小草身价百倍是不正常的，上面一句话决定市场的走向也是不正常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君子兰总还有翻身的时候。果然几年后君子兰仍是名贵花种，身价仍是居高不下，曾经批评过君子兰热的邓小平还拿它作为珍贵礼物送给叶剑英。可怜老宋们就是赶上了那个悲催的时刻，又没雄厚资金支撑，只能自认倒霉，宣告破产。卖花的几千元基本上还清了各种债务，我们继续过着每月借债十几元的日子。

那两年的事情就像一场大梦，没留一点痕迹，留下的只是在老宋心里的伤痕和化解不开的君子兰情结。老宋到澳洲时，偷偷夹带了几颗君子兰种子，在澳洲子又生孙，孙又生子，二十多年来生出了上千棵。他还想着有朝一日卖钱，可叹澳洲的野生君子兰就如野花野草一样蓬蓬勃勃，家家门口和街上的花坛到处可见，谁稀罕呀？但是君子兰在老宋心头已成块垒，目的是没有的，栽种就是一切。呼啦啦占据了半个院子又被虫子啃得残缺不全的君子兰似乎在提醒着他，秀才下海，三年不成。❶

【怀人】

## 写给明天的纪念

——我的父亲沈力

言真

与大多数子女一样，我并不真正了解父亲，尽管非常爱他，此时此刻提到他，泪便溢上来模糊了眼，其实他已辞世二十三年。1998年，在医院父亲病榻前，他突然对我讲起了往事，他的战友们如何牺牲的，我恭敬地听但感觉很累，便说：“爸爸，我想躺一会行吗？”那时我已人到中年，父亲往病床边缘挪了挪，让我躺在他身旁。十几天后，他去世，而我，他的女儿，却不在他身边。

所以，他讲的往事，埋在他心里半个世纪的往事，便像遗言一样刻在我心中。

—

父亲沈力，1922年出生于河北安国县，1998年病逝。离休前任中科院地质

研究所副所长。

他上中学正赶上“七七事变”，受一位地下党老师的影响，十六岁就跟着二叔离家抗日。几经辗转，到了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巧的是在延安还碰到了那位老师。后来他离开延安，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成了一名战士。

1944年某日，他从冀中军分区驻地出发，去友邻部队平西一个武工队办事，自然是在大山中了，随武工队晓行夜宿，一天，突然发现山脚下羊肠小道上有一队日本鬼子在行军，只有十几个人。父亲血气方刚想打，武工队战士们也想打，他们眼馋鬼子的好枪想缴获几条，武工队长最后决定打。于是居高临下瞄准开枪，枪声响起，捅了马蜂窝，霎时间漫山遍野枪声爆起，到处冒出鬼子追他们。

他们只能跑，跑过一座山又跑过一座山，不知道翻了多少座山仍旧甩不掉追敌，不仅甩不掉，更严重的是每进入一座新山，都会惹起激烈的枪声迎接他们，显然，撞到鬼子大部队进山扫荡。

实在跑不动了，已经有人受伤，在一座山的山顶，队长喘着大气，说，这么跑可不行，他与几个人开会商量一下，决定翻头返回逆着追敌插过去，天快黑了，趁夜色也许能从鬼子包围的缝隙中穿出去。全队马上化整为零，分成几组，每组二三个人，约定好了几天后的集合地点。

全部成功突围，几天后碰面时一个人都不缺，派人将两名伤员送到贝家花园贝医生处治疗，武工队则立即上路找平西主力部队报信。其间父亲病了打摆子，队长送他到山里的教堂请神父治疗。武工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部队，部队得到这个消息分析，这次鬼子这么大规模进山是要寻找八路军主力，于是决定转移下山去平原，同时派武工队先出发，过铁路线到京郊一带相机活动，搞出点动静牵制敌人。

父亲被留下随大部队行动。从此，与生死相交的队长和队员们分别。这一别便成了永诀——武工队到了海淀北边，派人去贝家花园接回伤员，其余人在苏家坨宿营等待。当晚日本军队包围了苏家坨，双方交火，战斗激烈，武工队员全部牺牲，队长被鬼子开膛。

那晚平西主力部队也已经到了平原，宿在一个叫七王坟或者祁王坟的地方，父亲他们都听到了远方的激烈枪声，不明情况，按原计划武工队应该不在那个方向停留。至天亮，枪声才渐渐稀疏，部队立即再次转移，父亲也接到命令告别这

个友邻部队，回到冀中军分区原部队。

后来，八路军在根据地边区，为武工队员们建了烈士墓，地处十渡景区。

父亲讲这些往事时，很平静，条理清晰，很多细小的事都记得。一直到文革后期，他的一位老战友被下放到苏家坨公社劳动，麻烦缠身的父亲还不忘托付老战友打听一下当年情况，复仇心啊！真打听到了，是村里有人向日本人告密，解放后这人被枪毙。

在父亲眼里事情已经了解清楚。我却不然，想知道队长队员们，他们是谁？他们的姓名？他们有后代吗？后代们现在怎么样了？父亲一概答不上来。我退休后做了一些调查，在档案馆居然查到资料，苏家坨那次殊死战斗，史称“西埠头事件”：1944年9月4日，平郊武工队副队长齐文清带领16名队员下山执行任务，夜宿西埠头村。因敌特告密，第二天拂晓被日军包围，突围时齐文清等6人牺牲，李庆江等7人被俘，只有尹君彦等3人突围成功。

西埠头是苏家坨的旧称。

我很震惊，父亲以为全部牺牲。那么，李庆江等被俘的七人命运如何？军史记载了吗？日军伪军旧档案中存有痕迹吗？我力不从心，无法查到。

很遗憾，父亲了解的比我还少。

也难怪，那是战争年代。他们那辈人经历得太多，对待生死已经淡然。

## 二

偶尔他会笑谈解放战争时，打张家口，强行军累得快要断气，一路跑一路扔掉身上背的东西，部队建制已经全乱了，不分官兵，就是一个劲地往张家口跑，渴得嗓子眼冒烟，终于看到一个水坑，都奔过去用手掬水喝，后面赶到的人挤上来喝，先到的人一边喝一边被挤得往水坑里面走。这可跟我心目中的画面大不一样，按道理应该是热情的乡亲们沿路捧着白开水和煮鸡蛋，慰劳亲人解放军。

到了张家口市里，国民党军队撤得慌张，办公室屋顶的电风扇还在转，父亲他们就地睡觉凉快得很，然而半夜冻醒了，风扇还在吹，冷得没办法只能大家挤紧点睡。

后来又变成从张家口撤退，母亲有一匹枣红色马驹，是父亲的战友送给母亲，因为她怀孕挺着大肚子。然而没几天这匹马被父亲当成了工作马，拉车运载公用

物资，而母亲换在牛车上颠簸行进，挎着一个小包袱，里面是边区政府发行的边币，连个烧饼都舍不得买，怀抱的纸币越走越贬值，最后只能买糠饼子，杂乱无章的撤退中，衣食简陋，母亲极度贫血昏倒。我严格意义上的大哥，就这样降生在途中民房，生下来很快就死了，我小时候问过父亲，你难过吗？父亲回答：哪能不难过，咧着大嘴才哭呢。我不太相信，因为他带着自嘲的笑，也因为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不缺男孩，这么说似乎不近人情，实际上他们那辈人，从战争中趟过来的，确实对孩子不够重视，甚至对生命的态度，与我们相比也有极大差别。母亲后来多病，她不是平日病恹恹，而是很精力充沛的，突然就得大病，年纪轻轻，大手术就动过两次。解放战争时期军队里的女性，大多这样，健康状况不佳，她们承受过太多的苦难，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

再后来是打石家庄，死人、鲜血，残垣断壁……

### 三

父亲一去无音信，我爷爷奶奶苦盼。北平解放，二老给报社交钱，要登寻儿启事。某日，一军人上门借扫帚，还扫帚时我爷爷跟他打听，说我儿子也是你们军队的，那军人问叫啥？一听沈力，说：“我认识，就在马路斜对面解放军画报社。我给你找去。”我爸这才知道，我爷爷一家子到了北京。

进北京城，仍然没安顿下来，随部队经常搬家，甚至来不及记地名住址，只说“司令部时，哪件哪件事”“那是在政治部怎么怎么样”以至现在我弄不清父亲到底在哪个部队，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都出生在陆军医院，即现在的隆福医院。朝鲜战争时父亲曾几次入朝，但不是战斗人员，没有参加惨烈的战斗。我从很小很小，对父亲就没有记忆，只记得住在金鱼胡同一个很深的四合院，里面热闹之极，似乎是部队家属的宿舍区。后院有座戏台，据说窦尔敦在这戏台看过戏。如今，窦尔敦的戏台下面炊事班养着猪，杀猪时猪拼命逃窜，炊事员追过来问我和二哥，看见猪往哪儿跑了？我和二哥手拉手来后院探险，二哥已经到了会说话的年龄，指了指，说“大狼跑到那边去了”。这个四合院紧邻东安市场的北端，几步跨过小马路就去东安市场买东西，是京城最繁华区，所以哥哥们记得，经常提起，而我，哪里记得，都是听他们说。我没有家的印象，全是军队托儿所（那时称为保育院）的记忆，我的每只袜子上都手绣着“小十二班沈真真”字样，不到



三岁，全托寄宿，一星期回一次家，这种情形持续到六岁。直到1958年父亲转业地方，我才回家住。

为什么不愿意在军队干了，父亲没说。只知道军队内部搞肃反运动时，他不同意整人，跟某个“坏透了”的同事起过矛盾。这对他是危险的，因为他不但出身地主，而且档案里还有我二爷爷进局子的记载。

#### 四

我二爷爷，就是上面提到的父亲的二叔，革命理想型青年。上世纪初，他到北京读书，因为向往共产主义，特意选择俄语专业，毕业后热衷于翻译苏联的政治经济类书籍。“七七事变”叔侄二人要去延安抗日革命，途经西安，二爷爷在陕西省政府寻到一个省长秘书的职位，停滞不前了。父亲便自己行动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经安排踏上了行程，中途被国民党宪兵队截获，父亲被押回西安。宪兵队通知我的二爷爷去领人。二爷爷到了宪兵队很生气，拍了桌子责问：我侄子什么也没干，你们有什么权力逮捕他？宪兵队的一位青年少校彬彬有礼，谦和地回答：他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如果真的干了什么，你能见到他吗？

二爷爷被噎住。

父亲仍然矢志不移，第二次偷跑成功，才到达延安。

侄子在眼皮底下丢了，二爷爷急了，毫无疑问是去了延安，他要找回侄子，方法很独特。

他在省政府的办公室里，有一位同事，两人办公桌对办公桌，久而久之二爷爷看出这位同事不同于常人，可能是共产党，他不点破，心知肚明而已，那时国共合作，两党关系表面上不算紧张。而这位办公桌对面的同事，也看出二爷爷已经心知肚明，也不点破，相安无事。二爷爷经常阅读侄子从八路军办事处拿回的新华日报之类的读物，再加上他以往的红色译作可能起了很大作用，稍加调查就可以判断他是进步人士，同事索性向他亮明身份，自己就是共产党。

二爷爷的独特方法是，向这位共产党讨要人，恳请他把侄子从延安退回来。共产党满口答应，却没有实际行动。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叔侄才重逢。这位共产党人是谁？二爷爷说，他名叫习仲勋。

日本投降后二爷爷回到北京，1945年至1946年期间曾经失业，他有一位郭



同学公开身份是北平政府的秘书长之类的实权人物，二爷爷去拜访希望他帮助找个差事，递上自己“沈桂高”的名片，名片没起作用，根本没有见到这位郭同学。

解放后共产党在郭的办公室发现了沈桂高的名片，于是我二爷爷被抓进了北京炮局子。郭同学真实身份是军统北平地区的负责人，跑到台湾去了。我二爷爷被关押了将近一年，审问时只是让老实交代，具体交代什么不明示。二爷爷搜索枯肠交代了一个够，唯独没提到曾试图拜访军统郭同学，他也是心虚怕招来麻烦，于是一直被关着。后来他的朋友辗转打听到惹祸的就是这张名片，1 想尽办法传话进去，告诉二爷爷关押的原因，这才赶紧交代，炮局子调查清楚了，不是特务，便释放了他。

不久，习仲勋到北京开会，造访西四二爷爷家。事先公安局通知：有客人要来。然后警卫人员在四合院里外转了一圈，习仲勋就进来了，聊天中，习仲勋听说二爷爷失业在家，便说，你跟我走吧，到我那里去。二爷爷拒绝了，半认真地说，此生不给共产党干事。习仲勋劝他不要怨气太重，看样子，二爷爷进炮局子的事，他知道得一清二楚。那是1950年，人们还敢随意说话。

虽然澄清了人也释放了，但是这件事对我父亲有重大影响，他有亲属在炮局子关押过，社会关系复杂，这在军队是大忌讳。1958年他在军队没有发展空间，于是转业便成首选。

二爷爷居家搞自己的俄文翻译，收益颇丰，后来政策不允许了，被安排到编译所，文革中经受煎熬，老伴成分是地主被遣返农村老家，儿子上山下乡去东北建设兵团，女儿是地质学院教师随着学院迁出北京，只剩他孤独度日，常来我家找我父亲聊聊散心，所幸他看到了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处境明显改善，1982年去世，享年70岁。去世前曾跟我父亲说，他这辈子冤。这都是后话了。

## 五

1958年，父亲转业地方，到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层干部，我也上小学了，对父亲仍然没有印象，很少见到他，每天从学校走很远去地球所食堂吃饭，偶尔能瞥见他跟一些领导在小灶房间吃饭，仅此而已，他下班回家，我早就在梦乡里了。父亲喜欢中科院的研究氛围，那时他们工作起来劲头十足，不分上下班。

有一次星期天休息不上学，我去同学家玩，进门吓一跳，她家客厅里有六七

个人，都蹲在沙发上兴致勃勃聊着，其中有我爸，我还是能认出来的。他蹲在长沙发边沿上，旁边是这家主人，长沙发上共三个人一模一样的姿势蹲着，活像一排麻雀立在电线上，高谈阔论，竟然是在开会，仍然是山沟里的习惯。那是卫一清家，地球物理所所长，也是老干部。

后来三年困难时期，才从食堂回归家庭，同舟共济。这段生活才使我明白父亲对子女深厚的爱，对他的儿子们不吝夸赞，喜欢画画的，夸他画得好，翻来覆去地看，真心欣赏，喜欢无线电的，也夸，哥哥自制出矿石收音机，父亲认真的用它收听，真心喜欢，对我和妹妹是宠爱，尤其对我。但是，规矩也大，立家规，跟长辈顶嘴绝对不允许，请父母帮助自己干这干那绝对不允许，这叫“哪有支使大人的！”父母有问的时候拖延回答绝对不允许，饭桌上的位置回家首先要做的事情等等等等，都有明确规定，稍有违规，他就怒目低沉着声音呵斥“没出息的！”情景吓人，都怕他。以至我从小就对“有出息”逆反。

## 六

1966年，一切都变了。

当时，父亲任大气物理所副所长，妥妥的“黑帮走资派”，声讨揭发检举批判，上台挨斗、“坐飞机”、挂牌子，一样不少。最大的罪名是配合所长卫一清将曾庆存、周秀冀、巢纪平三个业务尖子竖为红旗，给予荣誉。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三面假红旗！是白专道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如今这几个人都是院士。

一天中午，父亲拖着沉重的脚步推开家门，径直走进卧室，我们兄妹正在家等待父亲回来才能吃午饭，看到爸爸这样都不敢开口，面面相觑，妈妈出去到福利楼饭馆给爸爸买包子还没回来。一会儿，爸爸唤我送杯水给他，声音无力，我赶紧送进去，他躺在床上，起身接水，手颤抖不稳，他大口喝水时我惊惧地发现，他的后脖颈上有半圈割痕，血肉模糊，是挂牌子的铁丝勒破了肉，充当牌子的是一块沉重的黑板，挂在他脖子上弯腰90度挨斗。

在我心目中，父亲从来都是我们强有力的保护者，当他突然变成亟须别人关心的弱者时，我不知所措，用蚊子一样的小声嗫嚅“流血了，上点红药水吧？”父亲摇头，不说话。——如果胆敢抹药水，上班后一定会招致造反派的毒打。

妈妈买回来了包子，冲进卧室，爸爸站起来要去继续挨斗，妈妈劝他吃个包子，他不吃，有气无力地说：“不行，不能迟到。”我们面面相觑地看着父亲离开家。妈大哭，喊了一声：“还让不让人活了！”马上又咽回哭声，将自己关在房里。

这只是开始。

一天，家里人正在吃晚饭，大气所的工人、造反派小齐来了，带着一众人马。一进来就让家人都站起来，对着墙上的伟人像，做晚汇报、唱语录歌。然后命令家人都站在那儿，不许动，大门也不许关。他们就开始在各房间乱翻，一个装礼服的紫色箱子，里面的东西被扔出来，空箱子被小齐用脚踩烂。翻出一张只有三十元的存折，他们以为是三千元，严厉追问别的存折在哪儿？我家靠工资生活，收支平衡，哪里可能有那么多的余钱。他们发现弟弟的抽屉上着锁，态度恶劣地要钥匙。气得弟弟事后在日记里骂他们，吓得母亲赶快把日记本烧毁。我的日记本被当场抄走，并且被仔细查看，其中几处还去问父亲是什么意思？记的都是鸡零狗碎的小事，一个十四岁女孩的日记里能有多大乾坤？此后，我再也不写日记。

后来，我注意到，小说都被抄走了，我看半截的赫尔岑的《家庭的戏剧》不见了。而满书架的《干部必读》没人动。抄家时父亲已经进了专政队，早就跟我们失去了联系，母亲、大哥那天恰好不在家，而我正在学校狂热地闹革命，也许正抄别人家呢！我确实纠集过几个女同学抄过一次家，回来后，母亲狠狠地训了我一顿。抄家时，我家只有三个孩子在，妹妹最小，才十岁。其实，真没什么可抄的，父母一心奉公，两袖清风。

接着，停发工资，只发家属生活费。

## 七

大气所的造反派驰名中科院，脱颖而出的两个造反派头头王锡鹏和戴连模建立的专政队（俗称的“牛棚”）也不同凡响。那里汇集了各色人等，中科院党委书记张劲夫，以及他以下的众位干部；学术权威、老科学家叶笃正、朱岗昆等，还有“黑线”培养的中青年科研骨干，如大气所的“假红旗”。

逼供、审问、写检查是专政队的日课。造反派审问叶笃正：“你为什么要从美国回来？从美国回来你不是特务是什么？！”

平时，“黑帮分子”必须劳动，我父亲负责打扫厕所，他是办事非常认真的人，将办公楼上下楼层几个厕所，马桶里外和洗手盆都刷得锃白锃亮，以至于官复原职后，他对大楼厕所卫生非常不以为然，认为远不若他擦得干净。

这些人经受各种折磨自不必说。唯一的好处，看管严，不能自杀。

苦难仍在进逼。

父亲病了，胃疼，且越来越严重，疼得黄豆大的汗珠滴落，专政队头头仍无意让他去看病，父亲低头坐着紧咬牙强忍，手紧抓床板不动不嚷不哀求，大汗淋漓脸色惨白，同监舍的人向专政队看守求情，说这样要出人命，送去医院吧，明显病情危急，看守才行动起来，让人用平板车送到北医三院急诊，是急性胃穿孔。

此时我母亲接到通知也赶到医院，大气所随着来的造反派告诉医院，病人是走资派，母亲眼见着医院听到是走资派态度就变得很恶劣，实在拿不定主意做手术，但是不能再拖了，只好冒险同意。父亲很快被推进手术室作胃切除。医生在手术过程中，不断地高声呵斥父亲，又低声安慰：“再晚来一会儿就不好办了”“饭都漏进肚子里了，很脏啊，给你彻底清理清理。”看来只给了半麻醉。手术非常成功。医生不敢露出同情心。扭曲的人性，畸形的年代！

当上班游街、下班挨斗，点名批判在机关大院里普及共享的时候，孩子们获得了一种新的平等。一次，我去西苑大院的同学家玩，她爸在家，见到女儿的同学来，不乏幽默地聊几句，就上班去了。过了一会，我们下楼，看见一队“牛鬼蛇神”正在游街示众，走在前面的正是同学她爸。同学羞红了脸，我倒觉得没啥。还有一次，动物所办了一个“黑线”展览，其中一个展台，摆放的全是蝴蝶标本。批判者说，这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辈子光研究蝴蝶。什么“白专道路”“脱离实际”“崇洋媚外”，帽子扣了一大堆。其实这位挨批的，是中国著名的科学家，蝴蝶专家，国内唯一。那些标本都很珍贵。可当时我也觉得挺可笑——蝴蝶有什么可研究的？一次，跟伙伴聊天时提起这事。不料，这个小伙伴红着脸告诉我：“那是我爸。”我无地自容。

那时，我在人大附中上初一，在学校里闹革命，很少回家，参加过一次“联动”召开的大会。可惜，台上讲话的慷慨激昂，我在台下却昏昏然，不明就里。联动顽固坚持血统论，玩死了自己。

妹妹上小学，学校停课。没有娱乐，她整天在大院里看热闹。一次，听说前

楼一层有人上吊自杀，她们几个小孩趴窗户往里看，尸体朝着窗户，死人的舌头吐出老长，正对着她们。

那时，一楼居委会的革命夫妇，主动担负起监视我家的任务，对我妹妹、弟弟不是冷眼，就是呵斥，干涉颇多。几十年以后，我妹妹和弟弟一提起这两口子，仍旧恨恨，迎面撞见，也不理。

## 八

1969年初，我去内蒙建设兵团接受再教育。出发那天，刚从“牛棚”捡回一条命的父亲送我到中关村公交车站。一路无语，默默走到公交站，父亲才说了一句：“不要轻浮”。这四个字刻骨铭心，在兵团我谨言慎行，生怕给他惹麻烦，对异性更是冷若冰霜。我那时不懂，在那样形势下，一位父亲对远行的女儿能嘱咐什么呢？又敢说什么呢？

几年后我回北京暂住，此时父亲身体仍然不好，胃切除了三分之二，瘦削，又添哮喘和气管炎，断断续续休病假。他跟不上如火如荼的政治形势，唱不出成套成串的革命高调，老中青三结合，想让他复出，先试着让他主持一个会议，一张口就出了岔子。他赶时髦引用了一句套话：“毛主席的一句话顶一千句”。砸锅了。人人皆知，毛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孤陋寡闻在“牛棚”里待得太久了，整整减掉了九千句。幸而饶过他，不堪大用回家养病去吧。

后来我们在家里笑谈他的这个口误，父亲理直气壮地说：“一千句就不错了，一句话就是一句话，哪有顶一万句的！”隐隐可以看出他对谁不满。

文革中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时候，曾经到处派人出差，调查许多当权派的“历史问题”，无形中帮助老干部们恢复了联系，本来他们已经多年不知道互相的下落，这下，兴起了一阵怀旧风，大家串门做客走动起来。父亲正是在这时候遇到老战友并请他打听苏家坨的往事。

那时，父亲的许多老战友经常来我家吃饭喝酒，父亲也常常出去找这家那家的畅饮畅谈，身体和心情都好了很多。

有一次，我问他：“你怎么不找石少华呢？”

父亲一下子恼了，连声训我：“干嘛找他？干嘛找他！怎么想的？你！”

石少华那时是知名人士，江青的摄影老师。

我不敢问：您是不愿见石少华，还是不愿见江青的摄影老师？

父亲跟石少华是山沟里八路军时的战友，曾经一起在冀中军区画报社搞摄影，做宣传。后来父亲不愿意“成天到晚撅着屁股给别人照相”，说什么也不干了，离开了石少华的小组。

父亲不愿意成天给别人照相，常令我猜测。抗战时期物资极度匮乏，胶卷是珍贵之物，父亲他们不舍得给自己照相，每一张胶片都计算着，一卷36张，最后片尾还有半张粘在胶卷轴上，只有这半张舍得用在自己身上。所以我只见过两张父亲那个时期的照片，侧着脸，半张。那么，这么珍贵的胶片竟然要“成天到晚”给别人照，别人是哪些人？我见过家里保存的那个时期的底片，有大生产种地的、有拆毁炮楼的，没有见过一张首长的。

父亲对文革从不理解发展成不满，几年下来，全国混乱不堪经济下滑，物资供应匮乏，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老战友在一起牢骚满腹。他们本来疑惑是不是自己真的执行了“黑路线”？现在一看，搞得远不如自己那时候！不由得怨气冲天。

知识分子同样不满，同样发牢骚。我父亲一向对年轻科研人员非常喜欢，他们是家里的常客，敲敲门就进来了，打个招呼就走了，不拘小节。谈论最多的是时政，消息灵通。邓小平复出，胡耀邦分管中科院，对政治挂帅，阶级斗争那套不予理睬，工作务实，令大家兴奋，新消息不断汇集到我家，父亲有兴趣上班了，并且在大气所的会议上真诚发言表示支持耀邦同志：我来上班就是一个表态——很危险的表态，对政治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诡谲局面丝毫没有提防。不久，邓小平失欢靠边站，胡耀邦败退出中科院，造反派扬眉吐气，父亲愤懑之下不去上班，这同样是明显的表态。

军代表来了，说，不上班按劳保处理。父亲让母亲拿出两个精致的盒子，打开，里面是他的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让军代表看。父亲一句话也没有。军代表走后，我问父亲，怎么不给他讲讲这些勋章的来历？父亲说，他要是连这个也看不懂，还有什么可说的。此后，上边再没有提劳保的事。

## 九

1976年9月伟人去世，父亲表现得非常淡漠，各单位设灵堂追悼时，他忙着救助一位哭得昏厥的老同志，搀扶送医热心不已，对志哀表忠心置之不理。我

母亲为他担忧甚至跟他争吵，他固执不听。

致命之击来得很快。王洪文接管科技口的工作，他要杀一儆百威慑人心，拿几个老干部开刀。以整顿纪律为名，在二机部点了两个老干部的名，严厉处置。中科院要拿两个人祭刀，其中一个是父亲。形势紧张家里已经少有客人，大气所的巢纪平来通风报信：定下来了，对父亲的处置是开除公职，逐出北京。国庆节之后，将召开全院大会公布这个决定。多日来忧心忡忡的母亲被压垮，心理崩溃，开始埋怨，父亲一言不发穿上外衣走了。

我都看在眼里，心里害怕。天黑了，父亲还没回来。从他出门，我就担心他不打算活了。渐渐地怒火燃起，我暗暗发下毒誓：你们如果逼死我爸，我就要报仇，哪怕出卖色相也要爬上去，当官、复仇……。

深夜，终于等回了父亲。他去哪里了？从不提起。

国庆节假期后，父亲仍然不上班，等待，像屠场羔羊，引颈待戮。那天上午，大气所的一位科研人员王海文悄悄来到我家，与父亲进屋关门谈了很短时间，就匆匆回去上班。时间不长，妈妈满脸神秘的喜悦，忍不住要告诉我什么，示意我去卫生间关紧门后，她低声说出“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嘱我千万不要外传。刚才王海文就是来报信。说是大气所的高干子弟传出来的，王海文马不停蹄赶到我家，他也是担心我父亲扛不住，希望这个天大的喜讯能救他一命。很多年以后偶然看到陶斯亮的文章，写她的母亲也是躲在卫生间里告诉她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尽管我家极其普通，但是人同此心，何其相似。

父亲难掩兴奋，情绪变化过于强烈，竟然晕眩躺倒床上，我紧张地冲下楼跑到巢纪平家求救，巢纪平并不懂医，他握着我父亲的手连声喊：

“老沈，你不能出事，这时候你不能出事！”看来他也知道了。

四十多年了，我一直猜测，是哪个高干子弟将这个消息当作喜讯偷偷传播？他/她一定对文革有了清醒的认识。

## 十

“四人帮”倒台后，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写了《科学的春天》一文，洋溢着真挚的热情，近年来人们对他多有诟病，但这篇，肯定发自心底。

有人问过我，老革命，革命来革命去怎么革到科学院去了？问得好。那是特

殊的历史时期，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一切使然。幸而，父亲这样的外行，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尽可能减少干扰，他能做的也只是这些了。老科学家叶笃正曾经对我哥哥说：“我这辈子遇到三个好人，所以没挨过整，第一个是张劲夫，第二个是卫一清，第三个是沈力。”

全国解放以后，父亲曾经想重拾夙愿接受高等教育，但是部队不批准。那时有调干制度：进城干部可以考大学降分数线录取，母亲抓住了这个机会，父亲则遗憾终生。他属于对知识分子少有偏见的那一类老干部。

老科学家赵九章文革中含冤自杀，父亲恢复工作后，为赵九章平反昭雪忙碌，下班回家后还要准备材料，带回家赵九章的档案，那旧档案袋塞得鼓胀，听他说这是次要的一袋。里面什么都有，各式人的小汇报，连赵九章的女儿大学时在宿舍说的一句话，都有同学写来揭发检举的条子。亲戚的汇报也有，由此我那时才知道戴季陶是赵九章的舅舅。

老科学家顾震潮，非常绅士，总是随手拿着报纸，我亲眼看见他来我家做客，用报纸垫着触碰门把手，担心自己的肝炎传染，他患的是一种凶险类型的肝病，不肯坐，站着说，完事就告辞。他1976年病逝，没能熬到打倒“四人帮”。其时正是“右倾翻案”，我父亲用积极上班来“表态”之时，接到顾震潮病危通知，他们几个领导赶到病房。回家后父亲心有戚戚，说，医生说只剩一两个小时了。顾夫人赶来，顾震潮才露出笑容，但一瞬间笑容变成苦笑，他什么都明白。大家退出，留夫妻在病房。一个小时后顾先生去世。

叶笃正也是一位卓有建树的老科学家，父亲常与他交谈接受他的许多见解，改革大潮起步阶段，中关村依托中科院，涌现出许多计算机科技公司，中关村西边的马路，两旁小店铺鳞次栉比，欣欣向荣，叶笃正不以为然，告诉我父亲，那些公司没有科技含量，基本都是二道贩子。四通公司声名鹊起，父亲嘲讽：“他们有什么拳头产品？拳头个屁！”他对做生意的科研人员相当鄙视。

对文革中的造反派，他主张打击报复，方法就是剥夺他们搞研究的资格，撵到公司去。他私下跟家里人讲，把他们全都赶走！结果，反而成全了这些人在第一波商品大潮中淘金。他们本来就不是钻研科学的料，放在另一领域反倒如鱼得水。所以，柳传志在数学所的一间简陋小屋创业起家的传奇经历，在我看来也许是数学所党委书记的歪打正着。各所的老干部互相熟识，观念接近。



在政治观念方面父亲对我们兄妹有很大影响，尤其在坚决否定文革这点上，我们都赞同。文革末期，同许多家庭一样，午夜我们全家常坐在一起聊，深深担忧国家的前途，迷茫无助甚至绝望。父亲比我们走得更远，他不仅厌恶“四人帮”，对伟人也不再盲从迷信，我发现他对周总理也持有很深的怨气，令我意外，他认为如果不是周的一再调和，文革早就搞不下去了。那时人们热爱周总理，所以他从不说出不满，有一次我问他，你是不是不喜欢周总理，他点头，说了三个字：“不喜欢！”

## 十一

然而，1989年后，家里的和谐状态不复存在。

那晚，他彻夜不眠等待子女回家，对母亲说：“不对头，这不是鞭炮。”父爱深深，但难以抚平价值观上的深沟。饭桌上我们闲话琐事时，不小心流露出叛逆观点，他极敏感沉着脸不参与话题。有一次，甚至大怒，梗着脖子问：“共产党怎么你们了？共产党哪儿对不起你们！”顿时气氛降到冰点。

这是他的底线，他可以对曾经带领他们叱咤风云的领袖失去敬意，对党，却绝不容有半点非议。不可避免的，我们与父母之间，渐行渐远。

到底什么是人民的利益？他曾经参观过焦庄户，那是距北京不远的村庄，保存着抗战时期挖有的地道，是热门的革命教育基地、模范村。参观回来，他心情沉重地说：“跟土改前差不多。”那么，革命天翻地覆几十年，仍在原点，人民并没有得益，这能仅仅是几个伟大人物的错吗？他不肯挖掘，不想寻找真相。父亲这样的干部千千万万，勤勤恳恳，普普通通，只是不起眼的一块基石，一座丰碑的基石还是一道高墙的基石，就不是他们自己能定论的了。

如果他能够活到现在，看见权贵与民众之间巨大的利益冲突，他一定后悔自己的狭隘，一定会实事求是地承认：一个政党，不可能永远正确。也许他肯于认真回溯，他所忠实于的党，从何时开始变化的？

## 【怀人】

**二姨妈，二姨夫（下）**

张保和（美）

**二姨妈**

大约在1976年秋天，中源表哥去上海治疗血吸虫病，我就去清华二姨妈家陪陪他们住了一个多月。那时，二姨夫，二姨妈已经七十多岁了。

因为我经常在二姨妈家住，二姨妈总是以“儿子”称呼我。她是唯一一个这样称呼我的人。我听我七姨孙芸说，二姨妈是孙家九个女儿中最聪明的一个。可惜在她长大的年代里，女子受教育还不普及，她没有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否则，她也许也能成为一名教授。她一生都陪伴在二姨夫身边，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支持他。如果二姨夫是一模范教授的话，二姨妈则堪称教授夫人的楷模。

外婆家在1949年前里一直有厨师做饭，我的姨妈们，包括我妈，都不会做饭。二姨妈也不例外。（后来我的七姨妈孙芸在美国成了烹饪界的名人。我在另一篇名为“七姨”的文章里讲了她的故事，请有兴趣的读者移步）因为清华离城里太远，城里的保姆也不愿意去。雇来的保姆经常是待不长，烹饪技术也欠佳，让二姨妈一直为雇不到合适的保姆而烦心。因为无锡菜较甜，二姨妈经常叫保姆将菜做得甜一点。但无锡菜也不是所有的菜都甜，什么甜，什么不甜，或甜到什么程度都很有讲究。但保姆经常将所有的菜里都放很多糖，特别难吃。我记得二姨妈有一次想把我家的徐阿凤阿姨借到他们家里一个时期，但我的父亲没有同意，因为我们家都吃惯了徐阿姨的菜，如果没有了阿姨，日子也没法过。我阿姨有一个常熟同乡的好朋友，巧娥阿姨。巧娥阿姨本来在我们王府井家附近的一家民主人士家里当保姆，后来离开了，靠自己在王府井上卖冰棍为生。巧娥阿姨是常熟人，做南方菜自然没问题。于是二姨妈就想请巧娥阿姨到她家去做。那时正是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人们开始做些小生意。当时，二姨夫作为一级教授的月工资是345元，几乎是当时的最高工资。后来发现巧娥阿姨卖冰棍的收入比二姨夫的工资还高，只好作罢。

所幸在十六公寓的斜对面就有一个食堂，近在咫尺，有时候家里菜不够，二

姨妈就让我去食堂买两个菜回来吃。其中一个印象较深的菜是焦熘丸子。那时油是定量供应，每人每月半斤，在家里油炸的东西不经常吃。食堂的丸子里的肉其实不多，大都是淀粉，但炸了后再加些汁也还挺好吃。2017年回京住在清华中源表哥那里，还又去过那个食堂吃饭，几十年过去，比以前老旧了很多。

在清华时，我常去中关村服务楼买苹果派，大家都很喜欢吃。中关村服务楼听说最开始是五十年代里为了外国专家开的。到现在这家店还在，虽然已经经过了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不但地点没变，产品没变，连门脸也没变，实属不易。2017年回京时，我还去过那里买苹果派，想重温旧味。不料因这家店忽然在网上火了起来，每天烤的苹果派一出炉就被一抢而空，我去晚了，空手而归。后来还劳表嫂专门又跑了一趟才买到。尝后，发现味道也没变，还是很好吃。美国的苹果派也很有名，但相比之下，中关村的苹果派里面的苹果多，而那层面衣奶油味十足，也十分可口。对我来讲，还是觉得中关村服务楼的苹果派更胜一筹。

在清华时，有时和二姨妈聊天。她给我讲过一些她亲身经历的故事。其中一个云南鬼附身的事。在抗战时期，清华搬到了云南昆明，就是现在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那时，昆明市区还会遭到日机轰炸，所以学校的家属都住在昆明郊区，而老师和学生则住在市区。二姨妈的房东是金太太，二姨妈租了金太太院子里的一间房。有一天晚上，金太太的一个侄子和新婚的媳妇来看金太太，就住在金太太家。可是二姨夫那天在城里，二姨妈单身住在金太太的院子里。到了夜里，侄媳妇忽然说起胡话来了，被侄子已经过世的父母及家里一个老仆人附身。侄媳妇轮流替过世的父母及老仆人说话。他们埋怨走山路辛苦（云南多山），提及家里的很多往事，都是刚嫁过来的侄媳妇不可能知道的。折腾了大半夜，侄媳妇才停下来，昏昏入睡。早上起来，也记不起夜里发生的事情，只是觉得很累。二姨妈一个人在家里，将整个事情听得清清楚楚，把她吓坏了。二姨妈说这样的事情有发生过好几次，最后把那侄媳妇活生生的折腾死了。我的一个表姐，叶娃，曾在陕西插队，也亲眼看见过鬼附身的事情。她那里的一个知青曾在一个淹死过一个老头的水塘里游泳。之后，被那淹死的老头附身，开始说一口陕西话，还抽烟袋。但那知青一回到北京，就没事了，一回到陕西，就又发病。所以，我对鬼附身这件事深信不疑。

## 二姨夫

在平时，二姨夫总是非常平静，和蔼，从风度上，是个典型的学者。我从来没有记得二姨夫大声说过话。那次，因为在二姨妈家住的时间较长，也让我看到了二姨夫的另外一面，即他的紧张，焦虑。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就能让他非常焦虑。我记得中源表哥在上海看病后乘飞机回京，因为当时坐飞机旅行还不普及，需要自己安排从机场回清华的交通工具。为了这件事，二姨夫焦虑了很久。后来联系到中源表哥一个父亲是日本共产党的日本朋友，他出门可以派车，可以去接。但即使是这样，二姨夫还是在紧张，焦虑，担心如果出了意外怎么办。在二姨家住长了，我自己都会受到那种紧张气氛的影响。

在1949年以前，二姨夫曾在台湾教过一段书，这给他招来终生的麻烦。据说，因为去过台湾，他的档案里就有了特嫌而控制使用的记录。为了避免被迫害，二姨夫自1949年以来，就要特别谨慎，小心，犹如惊弓之鸟，提心吊胆，夹着尾巴做人。长此以往，在精神上，心理上的压力一定是非常大，使他变得非常容易紧张，焦虑。他在晚上不能多说话，否则就容易失眠。

中国在文革前很多年就开始用出身来决定大学录取的政策。我们认识的很多人都因为出身不好而上不了大学。据说，中源表哥没有能够在文革前考上大学和二姨夫的所谓的历史问题有关。中源表哥后来通过自学，取得了电视大学的学位。二姨夫在看到中源表哥的文凭后，都流泪了。二姨夫当时的心情一定非常复杂。一方面为中源表哥而高兴，但想到自己一生培育了成千上万的学生，而自己的儿子却因为自己而被剥夺了上正规大学的权利，又一定非常难过。这也是一种天理难容的政治迫害，世界上比这更没有人性的事情恐怕是不多了。

二姨夫的情况和我所目睹的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的遭遇，让我对知识分子在一个专制制度下生存的困境深有体会。

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建政以来，因为不允许有任何独立思想，在中国做知识分子变得异常艰难。清华大学的校训原本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但是后来这个校训居然被腰斩，只能说“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竟然被消失了！胡适先生曾说过一句名言，大意是在国民党统治下，人们没有说话的自由，而在共产党统治下，人连不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了。胡适先生实在有先见之明。在人连不说话的自由也没有的情况下，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为在说什么话而挣扎。

为了生存，每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要做一些妥协。这里的妥协是指违背自己的良心或良知，去说假话，谎话，甚至危害他人的话。我的另一个姨夫，叶笃庄，是个农学家。他生性耿直，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采取了不妥协的态度，拒绝说假话。他在1958年被秘密逮捕，到1978年被释放，坐了二十年的牢。当然，被迫害致死的也大有人在。这就是1949年后在中国不说假话的代价。

一些知识分子为了自身安全，政治，经济利益等种种原因，选择了紧跟形势。人想自保，也无可厚非，但要紧跟，就必须说谎，害人，做让人不齿，没有尊严的事情。有时如果做太多的妥协，即使从个人利益来讲，结局也并非理想。这是因为政治风云千变万化，异常险恶。万一风向一变，就会一脚踩空，掉入深渊。

北大历史教授周一良的公子周启博是中源表哥的好朋友，通过中源表哥，我和他也有一面之交。最近有机会看了周启博在网上的一篇回忆他父亲的文章和另一篇讲北大历史学家冯友兰的文章，让我感慨良多。说起来，我们家和周家还有些亲戚关系，因为我的一个舅妈，周耦良，就是周一良先生的妹妹，而我的那个舅舅丁用宏是我父亲的同事，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整得很惨。因为多种原因，冯友兰，周一良这两位先生在文革中做了紧跟形势的选择。而那时的主导形势就是极左思想，紧跟形势就是紧跟四人帮。四人帮倒台后，这两位先生的处境都很难过，都有过牢狱或被关押之灾。还有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讲究名声，不在乎脸面的人还是少数。冯友兰教授本是史学泰斗，但在办九十岁生日寿宴时，梁漱溟教授就公开拒绝他的邀请，让他很没有面子。

可能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一条中间路线：即为了生存，都要多多少少做些妥协，但适可而止，尽量为自己多保存一些尊严，良知。二姨夫和我的父亲应该就在此类人之中。但即便如此，也需说谎，也需出卖良知。

首先是要学会辱骂自己。最近我们在整理父亲的遗物中，找到了大量的他写的检查。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趴在桌子上写检查的印象也非常深刻。这些检查大概都是从1966年到1970年之间他花了大量时间写的。所谓检查其实就是无中生有地按照一些极其荒拗的政治教条辱骂自己。共产政权就是用这种手段在控制人的行为之余，控制人的思想。我父亲在他的晚年，经常说他之所以生存下来，就是学会了厚着脸皮做人。我曾在本书一篇回忆他的文章里提到这件事。

对二姨夫来讲，他的检查肯定也没有少写。还有一种强迫说谎的方式是写所

谓的批判文章。写批判文章和写检查很相似，不过对象不是自己，而是当时被当作敌人的一些人和事。文革中以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为首的左派力量曾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一个名为“梁效”的写作班子，专门为他们的政治宣传服务。梁效即两校的谐音，而两校即清华，北大。迫于压力，二姨夫在文革后期也曾去过“梁效”写作班里工作过一段。在左派势利倒台后，这也给他找来一些麻烦。

我父亲也有相似的经历。1989年六四大屠杀后，当局逼迫着我父亲和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出来，在报纸上，电台上，和电视上替他们说话。我父亲迫于压力只得做了。但他为此受到他自己良心的谴责，痛苦万分。在其后的一次电话通话中，讲起这件事，他跟我大哭。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他这一辈子唯一的一次失声痛哭。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勇气去抗拒逼他说谎的压力，但他还是有勇气面对他的良知，而不是为他的行为自我开脱。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个勇敢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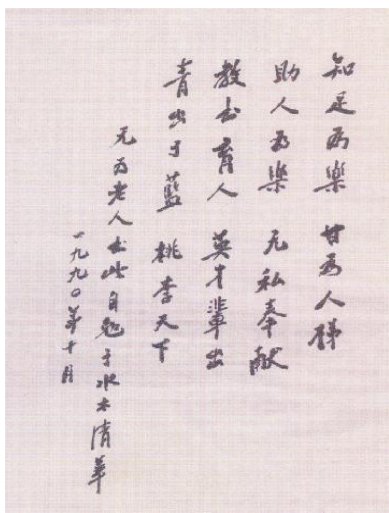
在我的记忆里，二姨夫一向守口如瓶，绝不对政治发表任何评论。但像二姨夫这么有聪明才智，受过这么好教育的人，想完全阻止他去思考恐怕不大可能。虽然他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从他的一些行为上恐怕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非常明显，他的紧张焦虑应是他思考的一个结果或反应。他的焦虑应该不仅仅是包括对自己状况的焦虑，对家人状况的焦虑，也一定有对社会，对国家前途的焦虑。

因为我从小经常到清华住，我总觉得自己也是半个清华人。在清华的生活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激励了我对知识，对学习的向往。我在1972年春节期间从内蒙回京探亲时，曾到清华看望二姨妈，二姨夫。在阔别清华多年后，又一次回到清华校园。看到清华的工农兵学员在校园里学习，使我萌生了强烈地想上学的愿望。但那时我还在内蒙下乡，还在为生存而挣扎，上学离我是那么遥远。

从内蒙回到北京后，我从1976年冬到1978年春在北京手表二厂工作。当时的北京手表二厂就在五道口路南的铅笔厂内，几乎就在清华南门的正对面。在工厂时，我想学机械制图。二姨夫还帮我找了清华的一个机械制图学习班。人家本来没有名额了，但看着二姨夫的面子，同意在教室里加一张凳子，让我参加。但不记得为什么，我没有去。我在1977年十一月的文革后第一次大学考试里，被分配到了北大附中考场。考试中间休息时，我就到二姨妈家吃中饭，睡午觉。可能在二姨妈家得到了一些知识的灵感，我那年考取了北京经济学院，终于实现了我上学的愿望。

## 后语

二姨妈于1988年去世，而二姨夫于1992年去世。由于我在美国，在他们最



后的年月里，没有能和他们在一起，也没有能给他们送终，非常遗憾。据我的父母和其他一些亲友的描述，二姨妈，二姨夫最后的年月是在失落，压抑中度过的。以下是二姨夫在去世的前两年，1990年题的一副字。

题字中的前几句话，“知足为乐，甘为人梯。助人为乐，无私奉献”，是他为自己的一生的总结与写照。但二姨夫说这些话时，心情很可能是无奈和沉重。

中国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全民淘金热，几乎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的为多挣钱而奋斗。起码在八十年末，二姨夫的最后几年里，作为一个当时中国的顶尖教授，他的工资不如当时一个在王府井卖冰棍的收入。但二姨妈，二姨夫对钱和名利从来都是看得很轻。对他们最大的打击恐怕就是他们的唯一的孩子，中源表哥的遭遇。二姨夫很有可能一直在为自己所谓的历史问题而导致中源表哥被剥夺了上正规大学的权利而自责。那种自己育人无数，而自己的儿子却不能受教育的惆怅与痛苦是一般人很难体会得到的。祸不单行，中源表哥后又在文革中被下放而染上血吸虫这一不治之症，使他不但一生被疾病所折磨，也不能去追求他在体育和其他方面的爱好和志向。直到他们最后的年月里，二姨妈，二姨夫也还在为他们身后中源表哥的身体和生活而担忧。这些都让他们心情沉重，看不到希望。

现在想起来，我实在是非常幸运能和二姨夫这样有才华的人度过许多时光，无奈我自己的天赋及后天努力双双欠缺，没能从他身上学之一二。可能二姨妈，二姨夫现在已经听不到我的声音了，我还是要感谢他们及中源表哥对我多年来的关爱，照顾。在清华的时光对我一生的各个方面都有极大的影响，也是我的一些最宝贵的记忆。☞

2022年2月八日

于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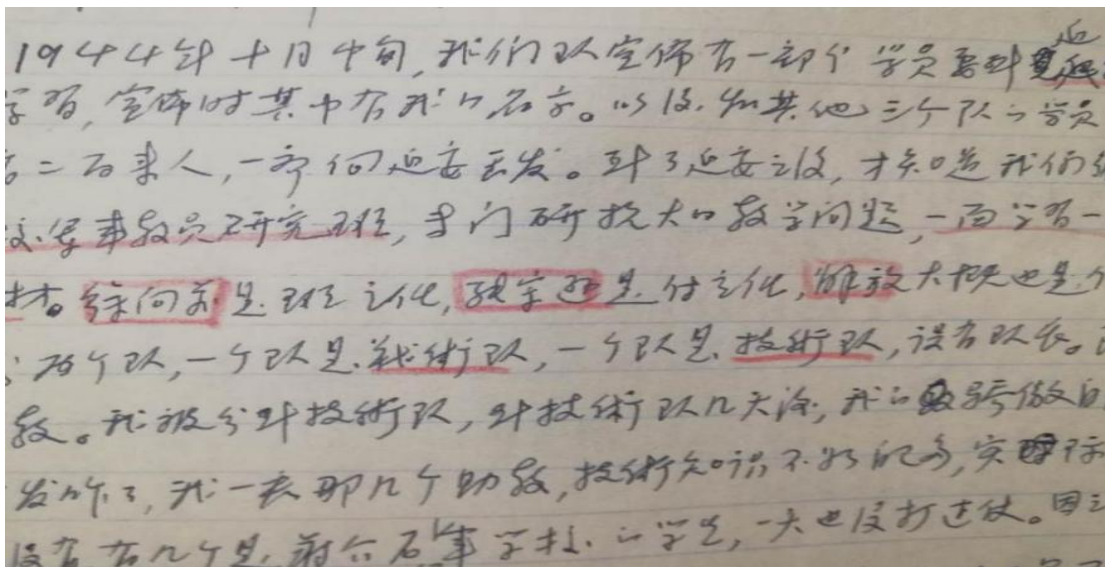


【述往】

## 入党没入伙

李飞飞

大约在1944年10月前后，抗大代校长徐向前在延安中央党校办了个军事研究班，亲自任班主任兼任教授，调在抗大任教的父亲来任助教组组长。副班主任为周士第、张宗逊、解方。用以培养中国的高端军事人才。徐帅与父亲为同乡，父亲视徐帅为兄长，时间一久两人话就多了。父亲把他和徐帅的聊天讲给我听，这是任何回忆中没有的。



父亲留下的手稿

随着欧战盟军转入反攻，亚洲战场结束也已成定局。

养精蓄锐的百万共军也做好准备下山“摘桃”了。但“桃子”如何摘却大有学问。各路大员在1944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时，就陆续越过层层封锁回到延安开会整风，统一思想。中共七大结束后每日都去“议事厅”相机受命。一个乒乓球台大的案桌前，由毛泽东亲自相机授命，得令者洋洋而去，待命者人如蜂拥，心急如焚。

徐帅为了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每日在大案台周围绕来绕去，有时甚至用脚踏出声音，但毛泽东却置若罔闻。眼见得肥缺被一一分派完毕，曾为堂堂四方面军



总指挥，“红军战史上唯一值得大书特书的统帅”（此语出自九大元帅编辑部综合编辑赵会生），威震敌胆的红军一方领军人物，最后竟以一兵团司令受命（也有一说为纵队司令），而把最重要的战略之地东北分给了整个抗战只放过一枪，后在苏联疗养的林彪。把以原四方面军为骨干的二野交给刘邓。

徐帅曾在延安窑洞神情无奈地给父亲讲过这段故事。联想贺龙精心培养的基本队伍，拱卫延安，效忠毛泽东，摘桃时毛泽东让彭德怀任一野司令，自己却成了一野的“后勤司令”（这曾是贺帅调父亲去任一野民运部当副部长时饭桌上说的一句话），1959年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时贺龙对彭德怀的恶怨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听了父亲讲徐帅的故事后，我感慨万千：主义常常是虚话，争名争利打破头。理想主义者，如果理想有问题终免一败。编了一首打油诗，题目是《徐帅》权做此文的总结吧：

当年风流独一枝，双臂能抵百万师。

只因入党没入伙，英雄一世未逢时。☞

【述往】

## 我所经历的北师大“清队”

安希孟

文革，北师大英语系三年级一位男士被北京郊区一位 miss 追求，信封上赫然写着：北京帅大。北京没有培养元帅的大学，这封误打歪着的情信，就到了男士手里。

—

过去说北大老、清华洋、师大穷。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文化革命北师大造反多是温文尔雅奉旨伐罪，有尚方宝剑掩护。虽说北师大是培养中学师资的，政治审查不如外语学院航海航空地质政法石油植树造林学院军事学院哈尔滨工大严格，但也必须根红苗正，虽说大家都不愿意上北师大，不愿意当中学老师，但北师大应该比北大清华更左更革命才好。

北师大学生偏于老实，中学教师嘛。只有我这个人不安分守己，文革最左，诸如打倒陈毅周恩来，也就是我比较激进。我真的希望打倒几个老总。其他同窗同餐厅同操场同树荫的人，都比较保守。但历史喜欢作弄人，偏偏总理觉着北师大反“二月逆流”，就是反对旧政府，让北师大推迟毕业——其实只要我一个人推迟分配就行——推迟到2005年退休。

## 二

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02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8年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1912年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学校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1931年、1952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先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历代校歌很甜美，很温婉。

### 1. 《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校歌》(1908年)

礼陶乐淑教之基，依京国，重声施，英才天下期。党庠州序仰师资，师资肇端在于斯，学日进，德务滋，诚勇勤与爱，力行无愧为人师。

### 2.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歌》1923年(词：范源廉 曲：冯孝)

往者文化世所崇，将来事业更无穷，开来继往师道贯其中，师道，师道，谁与立？责无旁贷在藐躬。皇皇兮故都，巍巍兮学府，一堂相聚志相同，朝研夕讨乐融融。弘我教化，昌我民智，共矢此愿务成功！

### 3. 《辅仁大学校歌》(词：于斌 曲：黄友棣)

辅仁以友，会友以文。吾校之魂，圣、美、善、真。三知是求，明德日新。蔚起多士，文质彬彬。福音勤播，天下归仁。世界大同，神旨永遵。祝我辅仁，其寿千春！祝我辅仁，其寿千春！

这些校歌，诗词宏丽多彩，不可谓不美。比较而言，德国人创立的辅仁大学校歌最典雅。但文革狂飙吹散了和谐气氛。文革响彻云霄的是红卫兵战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上阵，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革命忠于党，政府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它不好，马上叫它见阎王！杀！杀！！杀！！！！闯！闯！！闯！！！！”

十七年，北师大学术研究风气不浓，独立思考欠缺。教师，传声筒。我们历次运动，一家不认一家人，实际上知识分子，教师，在社会各个阶层里总是喜欢

表现得左一些。北师大尤其如此。社会科学，北师大无法比肩于北大。思想平稳和学术迟滞是一体。在记述文革史的时候，我们切毋忘记师大柔性的一面。

1965年秋，我入学不久，一天，在东门外铲草扫地，几个远道而来的农民问：“辅仁大学在哪里？”，我们学识浅薄，但一听辅仁二字，就知道不是好东西，连城里娃也懵了，当初选报大学时，哪儿有神马辅仁大学呀，遂答曰：中华大陆查无此校。幸亏老工友知道在定阜街，从护国寺进去。后来才从北大同学得知，师大校长陈垣是国宝，和被鲁迅痛骂过的陈源同名。也从人民日报上看到陈垣是人大常委。1971年我在后勤处劳动时认得几个旧辅仁工友，内有一人是天主教徒，就觉着怪怪的。我们曾经打倒天主。

### 三

1965年入学教育要端正入学动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这么多人这么多年咋就老树立不起来呢!)，就是要坚定专业思想，下决心当中学教师。入学教育，每一个人都会编造一套活思想(注意，不是死思想)斗私批修。只有我，每次无言可发。现在想起来，就说学好英语支援亚非拉也行哇。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那么会整词儿。

我班两位贫下出身，入大学后就被修改了家庭成分，从贫农划为富农。爱恨就在一瞬间。我同龄的北师大一位校友这样回忆：

“我是我们公社的第一个大学生。我考上大学，大队书记非常忌恨。我们在县里读书，考上了大学，他们不知道。次年我弟弟上初中，他们在弟弟的档案中写成上中农。此事我2014年才知道。1968年冬，我们将要毕业，师大照例向我大队发家庭调查函。我家下中农，姥姥家是贫农，舅舅是红军烈士，我父母是老实的农民。书记写材料说我父亲思想落后，不要给我分配工作，让我回家接受他们的再教育。我现在的同事，河南人，哈军工学生，贫农。大队把他的成分写成富农。”

可见此类事所在多有，地头蛇呀！我同班那位同学家庭成分忽地上升为富农，大队书记出具材料，揭发他们回村为自己家庭成分讨说法，是反革命翻案活动。

文革前夕，北师大中文系金宏达是个奇才。大四时，他以“时汉人”笔名在光明日报撰文批驳姚文元！我当时为自己的学校有这么一个才子暗自高兴。不过后来知道，这是人家把它当作反面教员发表，借以揪鞭子打棍子扣帽子，造成学术争鸣的假象。

水至清则无鱼。但人类有时候颇傻，要为鱼清理水草。清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时，张莱芬、隗仁莲去青岛外调刘淑文的 historical 问题，专案组杨金英暗中嘱咐，顺便调查一下同在专案组整别人专案的杨藻镜老师。这事得秘密，不能告诉别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人整人，人人害我我害人人。

于传曾是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将官还是校官，我忘记了。他也很紧张。还有“汉奸”孙晓康。有一次全系例行公事召开批判孙晓康大会，发言稿是我草拟，孔庆美上台宣读，代表我班发言。内容大概是日本烧杀掳掠，难道这就是你们大东亚共存共荣吗（孙晓康自供他上街刷过这样的标语）？驳得孙晓康哑口无言（他也不敢言）。这个历史污点其实早有结论了。

当然啦，我们系还有一个白俄和另外一个俄国人，就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什么？免于恐惧？我那时没听说过。现如今，好像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活该你整日价惴惴不安。

当时我班下班的老师是：邓蓉初、王昭碧、凤泉林、林永福、陈秋帆、陈培根、孙晓兰、蒋亨俊、柳绿春、濮阳翔、耿志国、于传曾、章景琪。这是二班。清理阶级队伍，我们没有人头落地的危机意识，1968年冬，晚上在宿舍还和解放军小士兵打扑克玩儿。后来我班又和四班合并，加进来的老师有蔡文莹、都祖尧、陈正方。

工宣队进校学习六厂二校经验，先是清队隔离审查，然后又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断解放一些有问题的人。当然都是已经解除隔离，但还是要花架子召开全校大会公开宣布一下，造成气氛，这就是群众运动。每一次解放一批人，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都要表现出激动万状的样子，要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有时还喜极而泣，眼泪似乎是真的眼泪。这是事先彩排过的演剧。大家情知有些儿言不由衷，但我们这些非牛鬼蛇神又何尝不曾经虚情假意呢。驾驭人的技术，马基雅维利的手法，打你一巴掌，再给个豆豆吃，你就感激涕零。当然各个击破，鼓励告密，互相检举，是最有效的。

北师大另外一些学者就比较顺遂：白寿彝。顾颉刚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五日的日记中写道：闻白寿彝在北京师大亦已被定为三反分子。此人在解放前靠人周济度日，垂二十年，解放后即若不相识。由于拍陈垣，得任师大历史系主任。由于拍尹达，得为历史所兼任研究员。以回民故，得为全国人大代表。以拍吴晗，得为历史小丛书编委。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白寿彝是北师大工宣队树立的榜样，受到大会表扬。

文革我在北师大外语系认得了著名诗人郑敏老师。1960年，她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调到北师大。她回忆说，下放到山西农村，正是“大跃进”时期，当地领导天天带着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看农民吃酒席。围着一个大圆桌，大家都大吃大喝，意在表明：“咱们农民也吃得上酒席啦！”实际上，这是大锅饭。当时农民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要下地干活，劳动强度极大，但吃的却越来越少，到后来，只能喝稀的了。

据郑敏先生回忆，她第二次正式插队到农村，跟当地农民住在一个炕上。劳动结束后，那家的主妇烧一大锅水，只下一点点面条。男劳动力可以吃上面条，但她就是一碗接着一碗地喝汤。郑敏老师说，她后来才知道，原来女劳动力只能喝面汤。那位主妇偷偷地给这位老师盛了一小碗面条，说，“你是毛主席派来的，要给你吃得好一点。”郑敏很感激地接过来了。可因为这面条没油没盐，一点味道都没有。她觉得难吃得狠，越吃越慢。那位主妇极羡慕地看着她，还问：“你怎么吃得一点都不香呀？”一听这话，她就更心酸了。在那位妇女看来，“能吃上一碗这样的面条就好了。”可郑敏说，这是她吃过的最难受的一碗面条。我觉得郑敏就是缺乏劳动人民感情，可我也觉着，劳动人民也喜欢好吃的呀。

当时，因为根本不可能洗澡，插队的老师们身上全长虱子。所谓的厕所，都有两个坑，一个小便，一个大便。小便完了，就得迅速地跳向另一个坑，否则就会把自己溅脏。她说，这种最奇怪的革命生活方式，真是不堪回首。那时的中国人口才六亿人，中国的农民多么伟大，多么能够忍辱负重！如果不去农村，她永远不知道中国农村是怎么回事，还以为都跟上海一样呢。然而毛主席说劳动人民尽管脚上有牛屎，也还是干净的，所以我觉着最好三年不洗澡。

她说，文革中写诗成了罪状。在一阵阵口号喧嚣的白天过后，她独自坐在书房，借着夜幕，悄悄地将手头惟一度藏的一部《诗集：1942—1947》付之一炬。

当时她认为，此生再也不可能写诗了，中国再也不需要诗歌了。全国将只有一个人的思想和诗词。“工宣队和军宣队来问她：“你真的下决心不写诗了吗？”她认为如果牺牲自己的诗歌生命可以换得中国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也是可以的，所以就回答说可以不写。”（见《遮蔽与差异——答王伟明先生十二问》，载《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诗论构》第45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从1948年到1979年，她在党的阳光下沉默了近30年。她大哥王勉则因抗战时担任国民党远征军的美军翻译，入狱十多年。1979年恢复名誉，重回上海古籍出版社。

七十年代末，昔日的还活着的九位诗友在京华相聚。曹辛之提议每人各选一组四十年代的诗作，出一本合集，书名就定作《九叶集》。此书于八十年代初出版，成为中国新诗觉醒的先声。以北岛、舒婷为代表的诗坛新秀也冲破传统藩篱，推动诗歌以崭新的容姿，登上新时期的文坛。诗言志，人可以有自己的志。庆幸的是，没有亡国灭种。

#### 四

耿志国，红小鬼，出身好，冀中平原人，较早参加革命。她家里有一个革命年代的糟糠，现在应该是离休革命老人了。他去苏联留学，娶了个洋妞，常到苏联大使馆，和一同娶了洋妞的中国姑爷们聚会 Party。中苏友好，一朝翻脸成仇，苏联姑爷变“特嫌”。1968年“清队”，他们教研室下到我们班，我是班长，老师们以为我们学生个个都是吃人的小老虎，提心吊胆，见了我低头哈腰，以为我掌控生死大权。他们喊我不叫名字，而是喊我“班长”。我出足了风头。耿志国的糟糠之妻和许多革命者进城之后喜新厌旧者的妻子的下场一样，和鲁迅的原配一样，离婚不离家。她是县委的机关干部，也做牺牲品。他那个苏联妻子中苏蜜月过后，就回到苏联，两人有书信往来。每次苏联来信（情书），都先落在工宣队手里。工宣队让我班董丽琴、王昭碧口译。那时候公民没有个人隐私，通信不受保护——耿志国你当年打家劫舍，应该懂得。信很肉麻下流黄色低级资产阶级腐朽没落——因为结尾竟然是：“吻你”（kiss you）！只听董丽琴同学（少女）脸“刷”的一声——工宣队师傅听到响声一看，只见——脸红了。那是什么年代，你还有时间接吻？大概每过几天，董丽琴就脸红一次。工宣队那个乐呀，



乐开了怀。

要耿志国交待苏修特嫌问题，也没嘛证据，反正穷追猛问，宁肯错案，不可放过。耿志国说他是小羊，说狼要吃小羊总能找到借口，我们就说他诬蔑革命群众是狼。成天打嘴仗，斗嘴皮子，鸡蛋里面找根骨头。连我们都烦了，也止不住乐了。细想，他耿志国即使想出卖情报，也得有库存呀。有些人里通外国也不够格——你掌握什么机要呢？如果他们对外人谈谈自己的感情遭际，那也不是神马大不了的，不会国破家亡。

## 五

文革初衷是一斗二批三改。斗走资派，批反动学术权威，改革规章制度。“清队”本不在此例。所谓扭转群众革命方向，不待他人而自成。“清队”是文革自缩，是收缩群众运动的重要举措。质言之，是要群众组织搞“窝里斗”。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这是文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清队”持续一年多，是文革中持续最久的阶段。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这说明清队是战略部署。清队中，北师大纵身一跃跳楼自尽的是祁开智教授。

濮阳翔（后来的教授）是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孙志毅（教师文革小组）端出来的。他的问题是三青团和忠义救国军。很吓人吧?!原来他在东吴大学，临“解放”时，国民党方面拉人，国共争夺，三青团发展团员，大概最末一班岗发展团员名单上有他（他说他自己不知道），但此后隆隆炮声就打破了入团梦，连他也不知究竟，就算入了团，也没啦个甚。比如我，文革前刚被支部讨论举手通过入团，还没领证举行典礼，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应该没有历史问题。但濮阳公每天跟着我，把我看作救星。结果大家都笑我。

濮阳翔的第二大历史罪状是参加忠义救国军，在我，就以为这可不得了。他是胡传魁老胡的部下，一定去过春来茶馆，和阿庆嫂智斗过。但他说他不认得阿

庆嫂。原来他少年时叛逆时期负气离家出走（安徽人），听说有一支抗日小股武装忠义救国军，但投奔未成，没挂单，没投宿。清理阶级队伍，他紧张了几个月，但我们到老儿也没为难他。因为我知道，那四个人和其他四个八个人无非是让我们彼此恶斗。其实在他们看来，咱们谁都不是好鸟枝头春意闹。昨日红卫兵小将大方向始终正确，一会儿就接受再教育成阶下囚。

濮阳翔还有其他思想方面的问题，就是文化革命前意识形态文化学术大批判，他写过些文章，批判三家巷早春二月。我使劲地从中找寻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异化精神污染，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真扫兴。那时候，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良心孝顺共和宪政爱情都姓资。不过，人的认知良知隐衷情欲私心，虽然那时还说不上受保护，但也没有被斗私批修，没被抖搂出来。因为副主席还区分小节大节。倒是濮阳先生曾经让郭郁生抄文章，越过男女大防，也成了清队要追究的问题。不过我们未婚，害羞，没有过问。据说他爱人和他吵架说，我要是告发你，你就坐牢。这封匿名信映射了人心惟危。我见过，但查无实据。我坚信他们夫妇有过“反动”言论。比如我们自己，私底下的谈话若抖搂出来，十个有十个会进局子。

濮阳翔后来可能做梦也没想到，他这个被整的人后来会成为狱卒、差役 jailer，衙役、兵弁，就是看押管理 51.6 分子董连猛。他的工作是陪睡、陪吃、陪喝，但不陪聊、陪斗。夜间看押董连猛，白天替他打饭。董君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刘文珊、都祖尧、郑守钧、黎浩智，原是落后分子，后来得到工军宣器重。我们的毕业鉴定，按照旧规，是党员负责同志负责，这次是都先生起草。阎王簿掌控。

## 六

凤泉林老师后来成“516分子”。整他最凶者，是他的同事老师们。老师中政工出身的人，都有口才，政治词汇随时上口，铿锵有力，斩钉截铁，有不容分辩的力量。斗争为纲岁月，人们善于在纲上线上行走。语言无风趣，无文采，但政治思路严谨符合套路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凤泉林在井冈山革委会作战部待过，肯定炮打过周恩来。时过境迁，多大罪状，全无印迹，只知他被关押时间最长。工作日由群众批斗，节假日由老师同学看管。几十年后的今天，才觉着一个青年

女教师看押一个青壮年反革命分子，有多危殆。他有力必多，多年与妻分居，“寡夫”，万一他鼓起了色胆……。他分解力必多的办法是转移视线：看报纸。但也看不上《纽约时报》，只有一份有火药味的人民日报，都是八股，颠来倒去就那几句官腔。凤泉林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横看竖看，倒过来折过来看，正着看反着看，从头至尾又从尾至头，报纸翻烂了，也不见新翻杨柳枝，味同嚼蜡，令人作呕。按说，这也蛮好，削弱了他的攻击欲。

但蒋亨俊老师怒斥：“好好思考罪行，别老看报纸”。把报纸收走了。竹筒倒豆子，挤牙膏，别得滑且滑，就是那时候学来的词儿。他几年没回长春探视妻女，妻子久不见到丈夫音讯，便来京探视。在要不要让凤泉林见老婆这有关世界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工宣队和骨干力量争论很久。蒋亨俊老师力排众议，坚决反对他们伉俪见面。但终归人性论占了上风，工军宣队比女政工干部开明：允许见面，当晚同寝，罗衾不怕五更寒。不近人情换作人性论。严厉训斥他的，还有刚才提到的濮阳公。中国的每一个人都要通过训斥更弱势的人求得自我优越感。

蒋亨俊老师反对凤泉林两口子团聚事出有因。文革前她是政治辅导员系团委书记。文革前，据说大学里有红黑两色大染缸，分别是党团组织和业务教师，两个大染缸争风吃醋争夺接班人（就是争夺我）。党员，政工干部，书记，无疑是进步的革命的可靠力量。但他们和我们都没有想到，他们自己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当然我更知道，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革前留校的大学老师都是经历严格筛选的可靠的革命进步力量，反帝反修都很积极。中美必有一战中苏必有一战这战略思维，大家彼此不相上下。马列主义老爷爷老奶奶彼此争吵，只是表明自己更左派而已。他们一张嘴，革命社论词儿就从嘴角溜达出来。我们无产阶级的江山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一定要牢牢控制在可靠的人手里，绝不能讲授西方教材比如莎士比亚古希腊尼采康德黑格尔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实在多。唱歌不能唱洋嗓，绘画应该画虎羊，钢琴不该家里放，二胡板胡才正当。

蒋亨俊老师因为比较“革命”，对学生政治要求过严，满口革命辞藻，文革伊始就被自己培养的进步党团员从医院病床上拉回学校批斗。我很纳闷，这么进步严肃说话滴水不漏很符合报刊的人怎么还有反动思想？她得的是肾炎，据她说同病房的病友过两天就有一个人被抬到太平间。她自己能正确对待生死了。但她

似乎对别人的性命也不在乎。后来整肃凤泉林，她很积极。因为文革前思想落后非党团员的凤泉林，居然造反成作战部军官，是可忍孰不可忍。她常常提到陈秋帆、都祖尧文革前是落后分子。

## 七

最近围绕杨绛的争论，成一舆论焦点。批评钱杨不过问天下苍生不关注社会，和为之辩护，虽然貌似对立，但均不否认知识分子应有社会担待、傲骨和凛然正气。他们的女儿钱媛，我们的老师，文革中和我们一样，尽力隐藏自己，保护自己。这没有过错。不过，在清除林江余毒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袖手旁观，不会把雷洋呼格吉勒图余祥林案以及社会纠错当作阶级敌人的恶毒攻击。因为我们不是获利集团。北师大外语系钱瑗老师文革不卷入，毫无疑问是正气，“正能量”。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对于钱氏夫妇的评论和纪念，就不讲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钱瑗老师是好人，文革的1968，河南淮河发洪水，我的同学——后来我的妻子——借过钱媛的钱。她解过燃眉之急。我们感谢她。据说有一位高年级学生借过他的钱，毕业后就“失联”。传闻归传闻，但我更相信那位同学后来肯定还钱了。知识分子民胞物与，不必登高一呼，自投罗网，但也可以发声——牛“哞”地叫一声。钱老师绝不是害怕烧伤手指的人，更不是抡棍挥棒扣帽为虎作伥之人。

杨绛去世，反响极大。一位友人微信说杨绛：“除了她的文学作品翻译作品上的造诣外，她对人生、对社会，都有通透深刻的认知，对极权社会的弊端敢于评揭。她是社会良知和正义脊梁骨。”文革史的研究，就旨在发扬傲骨。杨绛的女儿钱媛是我们的老师。

1960年春末夏初，北师大举办教改展览。筹办展览的人都是青年教师。搞美术的59届同学中有号称“妖魔鬼怪”的四员：历史系的王德一，人们把“一”念作“yao（妖）”，这便是“妖”；物理系一位会变魔术，“魔”；生物系一位早有“小鬼”的外号，是“鬼”；外语系的钱媛是四人中惟一女性，没有绰号，不过既然排行老四，那只好把“怪”字认下来。北师大的路旁和主楼高悬的毛泽东巨幅油画画像，据说处于王德一之手，另外一个画手隋玉梅，北京人，去大庆造过反，学大庆战斗队总负责。清查516，全校批斗，说她在大庆冒充怀孕，她大声说“造谣”。她后来分配到银川师范，教语文和美术。

北师大清查反革命集团“516”时，王德一受到诬陷，被逼自杀。王德一，1937生，1970年自杀。钱瑗于1959年毕业留校。1968年初，钱瑗与王德一结婚。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记载：

“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时，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得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的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得一已回校，阿圆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日回家。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钱瑗的小名）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德一就自杀了。”

“王德一之死，历史系的广大教师心中都是非常惋惜的。在他去世之后一年多，他所‘炮打’（如果真有其事的话）的‘副统帅’即殒命于蒙古温都尔汗草原。当时大家都说，如果王德一不自杀的话，现在倒成了英雄了。今天我们可以说，如果王德一不自杀的话，历史系会多了一位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

章廷桦老师回忆，1960年春节前后，钱瑗邀章廷桦等同学到家做客。钱锺书先生也出来帮女儿待客。钱老得知章廷桦是江阴人，高兴地说：“哎唷，巧啦，我是无锡人，我们是同乡嘛！解放前苏南人有个说法：江阴强盗无锡贼，盗与贼是一家子嘛！”接着他谈到北师大英语教授郑儒箴先生同他一起翻译《毛选》，说郑教授工作认真，笔语极好。1997年3月4日，北师大博士生导师钱瑗教授病逝，终年59岁。她是钱锺书和杨绛的独女。

文革前，《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委员会由钱锺书负责英文翻译工作。钱锺书的英文造诣堪比国学功底。当英国劳伦斯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拿到第一卷译稿后，惊叹道：“译者完全能驾驭英吉利语文和风格”。当时参加翻译和审订的有金岳霖、王佐良、浦寿昌、北师大外语系的郑儒箴等著名学者和翻译家。

## 八

我们那位从未亲聆警咳的老校长陈垣，史学家，毛泽东称其为“国宝”。法

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认为，只有陈垣与王国维才称得上“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傅斯年说过，“静庵先生（指王国维）驰誉海乐于前，（陈垣）先生鹰扬河朔于后。”日本汉学权威桑原鹭藏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出版后，很快发表评论，称陈垣是现在中国历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陈寅恪的学生戴家祥回忆：陈师和我在校散步时，自称平生最佩服的是王静庵（王国维）先生，其次是陈垣。1949年他在国共之间选择了后者，婉拒蒋介石和老友胡适的赴台邀请，而是留在大陆当了多年的大学校长。194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三次派飞机到围城中的北平，要接陈垣和其他一些著名学者南下，陈垣拒绝了。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年近古稀的陈垣在学生的陪同下，从兴化寺街5号步行到西直门迎接解放军，迎接解放。

文革前他每年两次来师大和大家见面：开学典礼的和毕业典礼。他在文革岁月也心惊肉跳。但文革中谁也没有想到拿批斗他来显山露水。倒是他的下属历史系一位老师施建中受到牵连。有一张陈垣几代学人五世同堂的照片被公开，算是捎带涉及陈垣。但我后来知道，陈垣的亲炙弟子并未留校，其弟子散布在全国各地。好像北师大历史系不是某个姓氏的天下——现如今大学留校的是亲属和弟子，以建立学派。但陈垣没有自己的家丁兵团。施建中，1940年3月生，江苏无锡人。1959考入北师大历史系，1962年北师大校庆60周年时被推选与陈垣校长、白寿彝主任、杨钊先生、杨子坤先生合影（即，五世同堂照片）。文革正盛的1971年6月25日陈垣寿终，终年91岁。他珍藏的4万余册图书全部交公。剩下的不值钱的书籍遗留在北师大图书馆一楼大厅。1971年夏，我翻检淘金，有语文课本，内有古文，我爱读。有一位国民党旧军官解甲归田，写了一册幻想乌托邦的小书，我拿了。

陈垣于1949年5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说：

“我也曾亲眼看见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区，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想难道这许多青年——酷爱自由的青年们都不知道那里是‘绝无自由’的吗？况且又有好些旧朋友在那里，于是你的话在我脑海里开始起了疑问。”陈垣写了对新生活的感受，指出以往同胡适的论学方法只是“实证主义”“有基本错误”。

“我现在明白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情况，我愿贡献你这种版本，校正



你孤证偏见的危险”。 “三十年前，你是青年‘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 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其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幡然觉悟，真心真意地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公开信往往是挑战书，私教用不着。决斗书要用公开信。强势一方觉着理直气壮。彭德怀后来也许胡陈黄泉路上终于相见，黯然神伤。陈垣还找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手拿放大镜，一字一句地阅读，思想为之一变。

文革中，陈垣家人写过两封信，一封给周恩来，一封给康生，说他整天提心吊胆、闷闷不乐，对形势的发展陌生、担忧，又不理解，只能保持沉默。

陈垣给胡适的信，和他给上头的信，可以做对观阅读。对观福音（Synoptic Gospels）、符类福音，又称共观福音、同观福音，这里就是对观福音、符类福音、共观福音、同观福音。

胡适不相信那封公开信是陈垣写的。给朋友写信，照道理应该邮寄给本人。私交呀，挚友呀，密友呀，心照不宣，心心相印，莫逆之交，股肱之交，才是朋友。这位饱学之士的多少盲目乐观与难堪尴尬，无人知晓。

刘乃和(1918—1998)，女，多年担任陈垣秘书。文革岁月一次批斗会上，见过她。

## 九

清查整肃造反派，左派整风，秋后算账，是战略部署，群众是被利用而已。在造反派，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自以为得逞，其实是过河拆桥。“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精心设计。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分别轻重，酌情处理。没提“当权派”，从此，百姓、普通人，矛头就要对准他们。左派整风，无须三年以后，不待三载。

北师大在整肃名义下走投无路的还大有人在。整肃，斗争哲学，精于此道者大有人在。井冈山革委会在遭遇清剿之前就把同伙造反兵团打成小爬虫。我的朋友郑艳峰芬，同班同学讨伐的大字报题目是“拉开序幕看好戏蛛丝马迹追顽敌”。井冈山革委会整人不遗余力，然后就轮到他们自己上耻辱的十字架。清查 516，这是师大历时最长，也最催逼人的运动，最惨烈，最无情，但也最不可思议：基层教师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大积极撰文回忆这一段历史。

纵观文革各个时期的反革命敌特分子、联动、516、十二月黑风、右倾翻案风，进而回溯历次斗争揪出来的和遭遇批判的人，地富反坏右、三家村四家店、胡风集团、章罗联盟，以及清污、人道主义异化理论、全盘西化论，所有的检举控诉揭发批判材料，无须去伪存真，无须筛选过滤，把当时罗织罪名构陷材料罪状原样拿来一看，就豁然开朗，就知道，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罪行。甚至叛徒特务汉奸恶霸黄世仁收租院、刘文彩，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人。冤假错案冤狱平反，而且宣告不再用运动整人，的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福音。文化革命更是人整人。人对人是豺狼（霍布斯）。整人者又被整。被整者反过来整人。你方唱罢我登台。我们有一种亡命在即的危机意识。“狼来了”之声不绝于耳。被清查出来的，即使按照那个特定年代的标准，也的确不会天下大乱血流成河千百万人头落地。倒是杞人忧天多一些。

工宣队进驻北师大以后的文化活动：1971年中共50周年，各系出版贺喜的诗词歌赋，叫板报，中文系出足风头。书法家启功为之挥毫，立功赎罪，竭尽对文革对林江献媚之能事。我有一首诗，歌颂乒乓外交，偷来两句，其中有“银弧条条，银球点点”字词，好像很雅，其实虚假。无病呻吟这个成语出典就在这里。陈铎老师（已故）见面就拿这两句开涮。迎接九大歌咏表演，曹宝剑袁剑青大出风头。文革时公映的电影译制片，是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越南的。《看不见的战线》《鲜花盛开的村庄》《卖花姑娘》和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伏击战》，享誉中华。流行的顺口溜：“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蚩蚩叫，中国电影新闻简报，罗马尼亚搂搂抱抱”。1970年至1973年，故事片还有：《南征北战》和抗美援朝故事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年》等。

顺便说一说闹剧中的平静。1967年10月14日，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

的通知。北师大是文革时期造反派活跃的中心之一，复课闹革命任务更加艰巨。11月3日起该校提出教改方案。要求废除现行考试制度，新的考试方法，必须突出政治，着重考查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学校要面向工农兵开门办学，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招收又红又专的青少年进入高等学校。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就这么来的。我和雷天生刘来牛等奉命去通县一个村子征求贫下中农意见，和农民朋友住一个炕上，好像什么收获也没有。1967年冬复课闹革命，刘宝英老师给我们讲授英语的两报一刊社论以及英语老三篇，就在北师大中北楼302女生宿舍。教材是钱瑗、严伯森老师编写，他们添加生词注释和短语解释。朗读者为大郭。复课闹革命还知道了，王居恒老师虽然是北外毕业，但他的英语发言实在不敢恭维。他朗读课文的录音，音调怪怪的。北师大的老师，外国归来的，汉语说得不流畅。比如严伯森，不知道“浩浩荡荡”神马意思，说，“我们三个从天安门浩浩荡荡走回来”，大家哄笑。☑

【述往】

## 六年芝麻官（五）

——一个县委书记的实践与感悟

李 辅

### 三十六、心惊粪坑屎全红

1982年秋，到香乐公社下乡，到了公社机关，说牛书记到了北薛靳村。我们又跑到北薛靳村，去找公社书记牛登贵。到了一个农民院落，我想方便一下，就上了院里的厕所。当地农民使用的是旱厕所，一个七、八平方米的深坑。到那里解手，一看粪坑内，所有的粪便全是红色。农民日常口粮全部都是红高粱，拉不出黄色的粪便。目睹这一现状，刺激了我，触动了，想想农民天天吃高粱，生活该有多苦啊！

1981年平遥全县小麦产量只有1800万斤。在讨论征购任务时，焦头烂额，完不成任务。直到现在我还记忆清晰。前边写到机关干部对县委书记因有胃病多吃一点细粮满肚意见。我当时想，国家需要小麦，机关干部、城市居民想多供应

点白面，农民改善生活也应该多吃白面，为什么学大寨非要种高粱夺高产不可，小麦难道不可以高产吗？

要说服基层干部和群众，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事实。1982年麦收后，到杜家庄公社调查，公社书记梁锡华告我，他们公社逐年扩大小麦面积，小麦连年增产，小麦亩产超过了高粱，高粱由于“三黑病”的困扰，是减产的趋势。高粱高产是表面现象，惯性化认识。后来调查全县高粱亩产的情况，确实比杜家庄小麦亩产低，而且差额还不小。

小麦生产省工、省时、成本低，高粱费水、费肥、费工，成本高。有了这一实例，可以说服干部和农民。

1982年就大抓小麦生产。秋季三千会前就让农业局、科技局针对平遥小麦种植存在的问题和准备推广的技术，搞了几组对比示范田，如种籽、播种机具、磷肥，不同数量的底肥等，在三千会期间组织参会人员去现场参观，眼见为实，不用多讲，起到了示范教育作用。

1982年平遥小麦备耕，从原来基本不用磷肥到施用了1500吨磷肥作底肥。1983年小麦大丰收，由1982年总产2500万斤，猛增到7600万斤。在夏粮征购上，过去“鞭打快牛”，水地区负担过重，县委在夏征前做通公社干部的思想工作，合理调整了小麦征购任务，夏收后只用很短时间，就完成了征购任务，夺得全区夏粮征购第一名。粮食局受到了表彰。不用等到秋季算账，夏粮生产和征购就回答了地委副书记胡光隆同志担心的问题。

1983年小麦播种，科技局拿出了标准化实施方案，进一步强化了增产措施，1984年小麦总产突破了一亿斤，创造了历史。平遥人再也不用发愁吃高粱面啦！

### 三十七、致富还需带头人

1982年冬，对农村的发展进行全面调查，发现了改革开放以后涌现出一批带头致富的先进人物，最出名的有刘生武、宋振华、王炳先、郭仰萱、雷桂英。

刘生武是岳壁公社东谷村农民。父亲曾是法院干部，“四清”时被整，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刘生武不甘心在村里务农，跑到外边打工修公路，见识广，结识人也多，更重要的是有生生不息地改变自己贫穷命运的动力。

改革开放以后，他觉得发财的机会到了。村里有个机械厂，破烂不堪。在承

包的浪潮中，刘生武把机械厂承包下来。承包以后干什么？他跑到农机公司门口蹲了三天，搞市场调查，看什么机器卖得最快。发现加工粮食的小钢磨，最畅销。他了解平遥南政公社农机厂生产小钢磨，就买了一台回去拆开进行仿制。他认为农民手里有了粮食，粮食加工数量增大了，乡村普遍有电了，村办面粉厂会有个大的增加，小钢磨肯定有销路。祁县召开农机展销会，他把自己仿制的小钢磨拿到会上展销，拿回了一批订单，当年就发了大财。他在各种会议介绍自己时说：“我叫刘生武，今年三十五，一年赚了三万五”。当时一个万元户就不得了，刘生武一年赚了三万五，当然有很大的震撼力！给农民致富、解放思想，树立了榜样。

第二个说说宋振华，老宋是沿村堡公社冀郭村农民，早在解放初期五十年代就被团中央授予植树造林模范。胡耀邦曾接见过。1952年成立了平遥县第一个互助组，“宋振华互助组”。曾获得山西省一等劳动模范称号。1956年宋振华在担任农业社长时，乡党委书记宋汝朋借牲口拉石头，把一个骡子撅死了。宋汝朋到宋振华村下乡，在地未解冻时，让突击种大麦。宋振华说现在地还冻着能种吗？先解决骡子问题，不解决牲口，不劳动。这一下惹怒了宋书记。宋汝朋滥用手中权力，以煽动破坏生产罪逮捕宋振华，判刑十二年，发配到阳泉煤矿劳改。在狱中，领导让有冤的申诉，宋振华喊冤，上诉，狱方认为反动思想和反革命应分开，宋有错误，但构不成现行反革命。坐了九个月监狱放出来了。

1958年春，宋振华弟弟当兵回来，养长毛兔，找到南堰村一家养兔户配种，人家拒绝。其弟不听宋振华劝说，偷了人家三只种兔。第二天公安局郝世明来村里抓人，碰上宋振华，责骂宋振华，宋不服，顶撞起来。郝要抓宋振华，宋说，我是县人大代表，你有拘留证、逮捕证？郝世明说，我有证就枪毙你！宋振华回答，你不枪毙我，不是我儿子做的。惹怒了郝世明，对宋又踢又打，逮起来了。当公安局把宋振华五花大绑，押往平遥城内路过村里一口井时，宋振华紧跑几步，一头就栽到井里。觉得没法再活下去，也不让你活下去了，就出如此下策，要寻短见。“天不灭曹”，捆绑宋振华的绳索有一个大疙瘩，正好卡在井口的砖缝里。宋振华吊在井里半当中，被公安人员拽了上来，救了一命。

农业学大寨期间，宋振华被“极左”捆绑了手脚，无所作为。但勤劳致富的心并未泯灭。自从给社员分配自留地以后，他的自留地经营的最好。1970年学

大寨农村搞“五大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要没收自留地，为此县里还给冀郭村派了工作队。眼看自留地的庄稼一派丰收景象，还盼望春荒时能补贴点口粮，减少点饥饿。如今却要没收自留地，断了这点希望。宋振华就找工作队，申诉理由，希望能在秋收后再没收自留地，被工作队一口拒绝。儿子听到工作队拒绝推迟没收自留地的请求，非常不满，就写了一张大字报，因为是半文盲，大字报错别字多，工作队把几个错的地方拼凑在一起，说宋振华在幕后支持儿子给工作队写大字报，声称“要杀了工作队”。就这样把宋振华隔离审查，在村子里关了二十多天。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改革开放刚开始，宋振华观察国家形势、社会动向，他觉得邓小平的政策变了，要叫农民发财致富呀！他不甘心贫穷，就七凑八凑，东挪西借，聚起了些钱，买了四十只羊，放牧在南依涧山上。到了1981年，原来四十只羊，已经发展成四百只。每年出卖屠宰就能收入几万元。村里有果园，因管理不善，树不结果，只出不入，没有效益。改革开放后，村里决定把果园承包出去。当时全村人认为无利可图，谁都不包，只有宋振华一人出面承包。宋振华承包果园后，精心管理，打了井，多施肥，果园硕果累累，获得丰收，赚了大钱，宋振华成了有名的万元户。

东郭村还有一个能人叫王炳先，也是在村里无人承包集体果园时，他承包了。每年冬天，他用小平车到城里拉无人要、不花钱的大粪，每株果树施一大桶茅粪，结果同样年年丰收，发了财、致了富。

东城的郭仰萱，沿村堡的雷桂英，在自家院内办起了蛋鸡场，规模养殖，起步早、效益好，都发了财，引起群众的关注和羡慕。

发现了这些典型，1982年秋，全县就召开双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将全县带头致富的人召集到县城开会庆功，宣传表彰，树立榜样，解决人们怕富、不敢富的思想，全县大奖了刘生武、宋振华、王炳先三个典型，号召全县人民向他们学习，勤劳致富，争取早日变成万元户！

当会议开始，参会人员从四面八方涌到县城，步入大礼堂时，许多民众看热闹，围观会议代表。不少人议论，这是什么“英雄模范”，都是过去“带头搞资本主义的一帮人”。

确实中国农民当中，有些人不管在“左倾”如何严酷压制，他们并没有甘心

贫穷。想富、要富、争取富，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受到批判和打击。当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到农村大地，正是他们这些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立即行动了起来，成了第一批致富的带头人。

他们是不是搞资本主义，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什么是剥削，这些人有没有剥削？这些问题困扰许多人，也逼着我思考回答。

还是用事实说话吧！从宋振华致富的经历来研究探讨问题。

宋振华的羊群，在南依涧公社唐河底村的山上放牧。唐河底村原来集体有羊群，有一个老羊工。土地承包到户以后，集体的羊群没有了，老羊工失业了。他不会干别的营生，生活陷入困境。宋振华发展羊群后，又雇上了老羊工，老羊工又有了吃饭的地方，每天发给一元钱工资，后来又增加到一元五，重新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按过去的说法，宋振华和老羊工是雇佣关系，存在剥削。农村实行土地承包以后，农民各分得一份土地，致富的起跑线是一样的，有的有能力，会经营，发展快，需要雇人帮助生产。有的人自己没有本事，只能受雇于人，像唐河底老羊工正是靠宋振华才有了生活出路。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一个有资金、会管理，一个能劳动，会放羊，相互合作，各尽所能，各有所得。

记得中学念书时有赵树理《地板》一课。说土改地主被斗后，分得一份保命田，由于以前坐享其成，靠剥削长工过日子，不会种地，分得土地长了一片狗尾巴草。批判地主、富农都是好逸恶劳，靠剥削别人维生的。

如今，又出现了穷富之分。像宋振华一样的人，完全是靠自己能耐发家致富的，他们不仅会劳动，而且会经营管理。有了宋振华，老羊工就有活干，有饭吃。没有宋振华，老羊工就无法生活下去。他们之间是互助互利的关系。硬要说宋振华是剥削，是“资本主义”，于事于理都难以服人！

联想到我学过的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和认识一下宋振华和老羊工的情况，也觉得剩余价值理论并不能说明现在的这种“劳资”关系。地主、资本家到底是怎么起家的？从我父亲的经历来说，原来是个穷光蛋，一文没有，靠当小店员、提茶壶、倒夜壶侍候掌柜的，学打算盘，学写字记账，后来自己成长为掌柜，直到以后自己独立经营店铺，当自己有了店铺后，仍然起五更睡半夜，又劳动又管理，十分辛苦，其实赚得同样是血汗钱。可是解放后被认为是“资本家”，剥



削起家的。

改革开放后许多人致富的现实，我觉得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和赵树理的《地板》理论去看待和认识，站不住脚，服不了人。给这些人扣上“资本主义”剥削的帽子，挑起矛盾，煽动仇恨，有害改革，有害社会。必须重新研究、分析、认识，不要总是抱着老皇历过新年，应该总结研究新的理论，指导变化了的现实。

### 三十八、勇于担当雪民冤

1982年5月的一天，从北京来了一位女同志名叫冀英，先找到办公室老王，后找我。见面后先拿出罗贵波、甘一飞、杨达等多位老同志的证明。这几位老首长都是抗战时期晋绥根据地八分区的领导。他们证明樊隽是抗日模范教师，思想进步，支持革命。抗战时期把三个女儿都送到革命队伍。樊家是根据地的堡垒户，许多老同志的妻子生孩子，都住到樊隽家里。他们的证明都表示“镇反”时，把樊隽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是冤案，应复查给予平反。冀英是樊隽的大女儿，是成克的爱人。冀英向我申诉“镇反”时，判她母亲死刑，所列罪状不是事实，是罗织的罪名，她母亲根本没有反攻倒算。她说错杀的原因是：当时她爱人成克在榆次地委书记，有一个姓赵的副书记对成克有意见，为了排挤成克，蓄意陷害制造的这起冤案。看看老领导们写的证明，言简意切，态度鲜明；听听冀英的申诉，声声血泪，深表同情。确知冤案制造者，也是整过我的人，义愤填膺。认真思索，这个案件，难度很大，必须认真对待。

冀英走后，我从县法院调来樊隽的案件卷宗，所列三条主要罪状：第一，原属范隽的一间半窑和一间马棚，土改时分给宋敬业，当时没腾出来。樊隽向宋的老婆邵翠兰说因没有做饭地方，想借用一间房，要钱给钱，不要房钱，用别的办法补偿。就这样樊隽和邵翠兰各锁一把锁。第二，樊隽原有的一块土地，分给贫下中农一半。在地界处，双方都种有玉米、豆角，秋天樊隽领上外甥采摘豆角，小孩弄不清哪一行豆角是他姥姥的，错采了地邻的一些豆角。第三，正月村里闹红火，樊隽的外甥和宋宝成的儿子看热闹互相拥挤，后来扭打起来，互骂时，樊隽的外甥说了一句：“你家分的地还是我姥姥家的呢！”就这三件事分别定罪为：霸占贫下中农土改果实；侵吞贫下中农胜利成果；教子复仇，反攻倒算。以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枪决。许多人回忆，在把樊隽押往刑场时，樊一直高喊“毛

主席万岁”，以此鸣冤！

看罢案卷，觉得棘手。一是制造冤案的主儿，手握大权，整人成性，一定得认真对待，不能给他留下任何把柄。平反该案一定要有充分的依据，充分的理由。二是单从案件列举的事实，事隔多年，有的当事人也不在，很难查清真相。我考虑要弄清此案，必须从根子上下手。冀英本人申诉时就认为把她妈划成地主成份是错划。县委决定让民政局组织调查组，复查土改时的经济状况，依据当时的政策是否应该划为地主。

民政局调查组从6月18日开始复查，到9月5日查明。樊隽当时拥有土地为本村人均的1.15倍，不达二倍。家里本有五个劳力，三个抗日的女子，当时没有计算。樊隽丈夫死后，原来的管家，已成为“上炕长工”，关系已经变化，也应计入劳力，不应再算作长工。当时参加土改的工作团和贫农团都证明樊隽是错划为地主。

民政局汇报后，县委认为，既然成份错划，不是地主，那么原判反攻倒算，教子复仇等罪行，就不推自倒了，应该彻底平反。

冀英三姐妹，压在头上的长达三十多年的“政治大山”终于推倒了。冀英说，因她母亲的问题，她的丈夫成克受牵连被免去了地委副书记的职务，一直限制使用。她们姐妹三个抗日时参加革命，但由于家庭成份，特别是母亲被杀，一直被打入另册，抬不起头来。从这个案件的办理，我又一次看到党内斗争的尖锐，搞阴谋的人为了达到私欲，什么手段和毒招都会使用。要不是三中全会纠正“左”的思想路线，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樊隽的沉冤不可能昭雪，冀英姐妹和成克同志的政治包袱不可能卸载。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不应考虑个人得失，应该勇于担当，为民雪冤！

如果追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冤案？得先说土改运动。

山西作家鲁顺民先生，对晋绥1947年的土改作过很多调查，编入他的《天下农人》一书中。他采访贺三女，她说：“土改就是一场运动，运动一来就没个好。”李拴计说“张五元给定地主成分，其实到土改的时候，他连一亩地也没有。那时候定成分，好家伙，翻三代，你爷爷是地主，你也是地主，极左嘛。”晋绥区主政的李井泉“左”的有名。刘少白1940年和牛友兰两位开明绅士拿出一半多家产办起兴县农民银行，给共产党解决经费。刘先生当时还担任晋绥边区临时

参议副参议长。就这样两个有恩于共产党的人还惨遭斗争羞辱。牛友兰先生被中共高干儿子牛阴冠牵着铁丝穿鼻游街，这一惨绝人寰、违背道德伦理的兽行，折磨的牛先生无法忍受，绝食而亡。这样对革命有巨大贡献的人，都不放过，何论其他受难之人！

上边的左，煽动了下边的左。鲁顺民先生在《天下农人》一书中，介绍了他与著名作家、曾在《晋绥日报》当编辑的胡正聊天，详细探讨了《晋绥日报》“发展脉络”。其中说到“是贫农还是二流子”的争论，报纸为“二流子”正名。“二流子好吃懒做还变得有理了，理直气壮了”，报社的这种解释与前面的报道是一脉相承的”“这样的倡导无疑是危险的”。

“二流子这一群体，长期以来受着乡村社会内部的鄙视和歧视，这个名词本身就是个恶谥”“但是，此时此刻，尤其是在国共两党的战争敌时状态下，忽然对这一群体青睐有加，将这一个被压制已久的群体推到运动前沿，其爆发出来的非理性、无秩序的破坏力应该相当可观。”鲁顺民先生深刻揭示：“马克思说：无产阶级除了锁链，一无所有。而这一群体的人无拘无束，连锁链也不曾有过，乱起来，他们是无所顾忌的，得不到什么好处，至少可以看个红火热闹。”

晋绥土改的左倾，“与这种明显冒险的倡导显然有关系”“正是这样一种与民间日常伦理相悖的倡导，才使晋绥根据地后期们土改运动急遽‘左’转”。鲁顺民先生文章讲得十分具体、细致、深刻，用词也十分考究。我摘录其主要观点，不一定准确。要我说，本来就没有不左的政治运动，也没有不产生冤假错案的政治运动。

再说说“镇反”运动。我引用老公安尹曙生先生的几段文字：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废除民国时期制定的“六法全书”，这样，共产党在接管全国政权后，就面临着在没有任何法律的情况下，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毛泽东是不相信法律的，他也不急于制定法律。他始终认为法律束缚人们的手脚，欣慰地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得意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他迫于国际、国内压力主持制定的。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认真执行过，也不准备执行。

在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运动中（在他领导时期，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一直进行着，没有真正停止过），毛泽东继承、发展了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就

是直接凭借暴力而无须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的理论，迷信暴力、相信暴力，而不相信法律。暴力对于推翻一个旧世界，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只能依靠法律。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规划了全国解放后的施政纲领。全文充满了无产阶级暴力论，没有一个字提到依靠法律手段来对待敌对阶级和敌对分子，这是他的真实想法，绝不是他的一个疏忽。

1950年10月开始至1953年结束的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全国逮捕了300多万人、杀了70多万人（有的说100多万人），却没有任何刑事法律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和标准，没有任何诉讼程序，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随心所欲。虽然政务院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那只不过是个行政法规，不是刑事法律，没有任何诉讼程序，都是一些原则规定，很难掌握。整个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按照他的162次批示、电报和几个根据他的意见下发的中共中央文件，包括他亲自撰写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他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法律（中央文件），主观臆断，给各级党委下达镇反中杀、关、管的具体指标、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时间（见《毛泽东与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用什么标准来杀、关、管呢？在中央文件和他的批示、电报中，都是些很笼统的概念，很难掌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规定对什么人应该判处死刑，往往是“罪恶严重，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横行乡里的东霸天、西霸天”，“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害者”。这样原则的规定，教人如何判定一个人该杀不该杀呢？为了完成领袖规定的在一定时期的杀人指标，原来认为不该杀的变成该杀的。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初期的1951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在饶漱石的领导下，对捕、杀人是很小心谨慎的，当时只逮捕了2万余人，杀了200余人。毛泽东很不满意，致电上海市委：“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1500人左右。”上海市委不敢违抗，上报中央说市委决心“再放手逮捕10000人，杀3000人、关4000人、管（制）3000人”。毛泽东立即通报表扬，规定上海以后每隔几天就杀一批。上海市委认真贯彻执行，每隔几天就

枪毙一批人，没有辜负领袖的期望。上海最后以杀 7000 余人结束第一次镇反。大大超过领袖的预期。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党内斗争中，毛泽东把党规、党纪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说过：党的决议就是法，党委开会决定的事项就是法律，必须执行。党的决议可以定性某些人是反党集团成员，某人是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内奸、蜕化变质分子、贪污分子等等十几个罪名，无须司法机关确认、审判，就成为专政对象，把一个政党的纪律、条例，变成了国家法律。

土改、镇反运动冤死的绝不是一个樊隽。

樊隽被冤杀，晋绥边区土改的“左”，使她被错划为地主成份。镇反时，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党委握有生杀大权，党棍借机杀人，实现排除异己，樊隽必作冤魂。樊隽的冤案教育人们，“左”会害死人的。一个地方官，必须时时防“左”。牢记依法执政，依法办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 【资料】

#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反党罪行 50 条（一）

教育部革命联合委员会批蒋战斗队

1967年3月24日

## 最高指示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是一个钻进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是彭真反革命集团的一员干将，是盘踞在高教战线上的“阎王”和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蒋南翔疯狂的攻击和诋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百般抵制学习毛主席著作，狂妄地反对中央的方针政策。十余年来，蒋南翔不遗余力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积极的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竭力为在我国实现反革命复辟鸣

铤开道，蒋南翔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大肆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极力培养个人势力，大搞独立王国，实行法西斯统治。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蒋南翔紧跟彭真，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在党中央的支持与关怀下，经过广大革命群众英勇顽强的斗争，终于在去年6月初将这个钻进党内并窃取国家重要职务的定时炸弹挖了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一个胜利！蒋南翔被揪出后，一直拒不低头认罪，多次进行反扑，最近又乘社会上大刮反革命复辟阴风之际，疯狂进行翻案，为了使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飘扬在高校阵地上，彻底挖掉高教战线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揭深揭透、斗倒、斗垮、斗臭、现将蒋南翔的反党罪行简介如下：

### 诋毁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 （一）诋毁毛泽东思想

蒋南翔一贯贬低、诋毁毛泽东思想，他恶毒地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高峰的说法好，说顶峰就不好再发展了，还是要去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只念四卷是不够的，例如关于经济学方面主席就没有什么东西。”1966年他在一次修改文件的会议上，别有用心地散布说：“中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有争论。”明目张胆地反对林彪同志关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的科学论断。

1960年4月，蒋南翔在清华大学召开的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叫嚷：“学习毛泽东思想，要提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要提毛泽东思想为最高，不要提毛泽东思想是最高地位。”蒋南翔还在对清华大学的讲话中，和杨献珍唱一个调子，把毛主席著作污蔑成是“小册子”，不是经典著作：“光学这个，不基础不牢靠等等。

#### （二）反对学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蒋南翔对广大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对语录进课堂极为仇视。他和黑帮头子陆定一唱一个调子，攻击是“贴政治标签”，“形式主义”，“庸俗化”和“白莲教念符咒一样”等等。他还恶毒地说：“现在有人学毛著是装了一脑子，记了一本子，带了一捆子，摆了一摊子。”1965年以来，他一直大反教师在教学工作 and 编写教材工作中运用毛泽东思想。在一次教材会议上，他污蔑在课堂上

和教材内用毛主席语录是“贴政治标签。”有的学校在课堂考试和批改作业中引用主席语录，蒋南翔就污蔑是“庸俗化”“贴标签儿”“除了不必要地加重师生负担以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听说一机部教育局的同志在北京机械学院提倡主席语录进课堂，立即派人去调查。搜集“缺点”，通过《高教简讯》公开批评，大骂这种做法是“搞压力”，“强迫知识分子学习主席著作。”蒋南翔还亲自写信给一机部部长，企图压服教育局的同志。他还通过《高教简讯》攻击“在体育中贯彻毛主席思想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胡说什么“有的学生引体向上上不去时，体育教师就在下面大声念毛主席语录，结果还是上不去。”“背着语录牌赛跑不顶用。”蒋南翔给清华学生做报告，讲到学习毛主席著作时公然叫嚷学习毛主席著作“也可以打瞌睡。”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反动面目。

### （三）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

蒋南翔出于他反动的阶级本能，极为害怕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他一贯反对向外国来华留学生宣传毛泽东思想。1963年8月，他在外国留学生工作会议上明目张胆地说：“教育他们（指外国人）学习，本身就是马列主义”“要寓政治于教学。”他限制大家向外国留学生宣传毛泽东思想，说什么“如果要他们学习马列主义，他们可能反对”“他们不愿学习马列主义。认为我们是洗脑筋，这反而不好”“但规劝他们学习业务，这是名正言顺的，理直气壮的。”1965年7月，蒋南翔对出国留学生的讲话，公然禁止中国留学生宣传毛泽东思想，他声色俱厉地说：“你们在国外不要骄傲，什么中国是大国，有毛泽东思想领导等等，可不能来这一套！”

### （四）反对出国留学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

蒋南翔对我们的出国留学学生热爱毛主席，强烈要求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意见横加压制反对。1965年7月他给留学生做的报告中大放厥词，胡说：“读毛主席著作不能绝对化、固定化，学习毛主席著作是红，对，也不完全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就一定红，那不一定。”他还把中国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帝国主义头子为了反革命目的而研究毛主席著作相提并论，胡说什么“美国的杜勒斯也研究毛主席著作，他就不红。”蒋南翔还采取加重学习任务的办法来限制留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叫嚷“假如你学了三年，只学会了字母，什么也没学会，但是能背诵四卷毛选……，那就辜负了国家和人民的希望，不能叫又红又专。”他



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已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 （五）反对提毛主席思想挂帅

蒋南翔反对毛主席思想挂帅，坚持资产阶级思想挂帅，业务挂帅的反动立场，是顽固的、一贯的。他对毛泽东思想十分反感、仇视。1961年起草《高教六十条》时，解放军的文教部门提出建议，条例应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写上毛主席思想挂帅，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蒋南翔却极力反对，认为“高等学校与解放军不一样，不能照搬”，“不打算接受解放军的意见。”还恶毒地说：“统帅只能有一个，不能多了，搞多了，统帅就成小兵了。”

1961年11月3日蒋南翔主持修改《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时，把第一章第一条“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别有用心地砍掉了“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几个字。

#### （六）反对在文件中提毛泽东思想

蒋南翔反对毛泽东思想已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不仅在起草文件时大砍“毛泽东思想”语句，更恶毒的是借机影射咒骂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

1964年直属高等学校理工科会议上，草拟了一个改革研究生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在蒋南翔提议下，借口去掉“水分”和“烦琐部分”，把其中提到“毛泽东思想”，学习“解放军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的地方统统都删掉了。1966年4月蒋南翔修改一份学制改革的文件时，有一段话：“学制改革的这些基本趋向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的精神的。”他恶毒地叫把其中“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勾掉。教学二司起草的关于教材建设的文件中提出“要编出一套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式的教材”。蒋南翔看到后又立即把“毛泽东思想”几个字砍掉了，（他还说：）“不要把大大小小的成就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不要什么都算在依靠毛泽东思想的账上……，否则反而不尊重毛泽东思想了。过去蒋介石纪念孙中山，有中山街、中山堂，甚至有中山厕所。”

#### （七）打着红旗反红旗，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林彪同志

1965年下半年以来，蒋南翔经常利用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意义的执行上级的指示……”的话，大谈所谓要“独立思考”，

不要躺在中央指示身上，实际上是影射林彪同志，反对把毛主席的话当成最高指示。在1965年的高等学校政治工作会议上和部内全体干部大会上，蒋南翔多次别有用心地说什么“蒋介石讲话后总是问他的部下有何感想，他的部下回答是：‘报告委员长，不敢想’”。他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

#### （八）反对毛主席的认识论

蒋南翔有一套系统的修正主义教育理论，他狂妄地提出“理论—实践—理论”，这个公式同毛主席的认识论相对抗。他胡说什么：“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可以是‘实践—理论—实践，也可以是理论—实践—理论’。正确有效地组织后一个过程，正是学校教育的责任。”

#### （九）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

蒋南翔对三面红旗表现出敌对阶级的仇恨，在1961年，他看到中央某负责同志的报告中讲到国民经济好转和农业生产增产时，忍不住他心头之恨，亲笔批上：“胡说”“浮夸”等恶毒语句。

1962年，蒋南翔在给清华大学同学做“目前形势及学校工作问题的报告”时，恶毒地攻击总路线，一再强调总路线是“在完美的过程中”，要在执行它的过程中去发现“漏洞”，使其“一步一步更健康。”他大肆攻击人民公社，说公社在推广过程中“可以通过典型试点”，今天“既然”成立了，而且“暴露”出一些工作中的“缺点”，今天就要去克服这些“缺点。”蒋南翔还恶毒地歪曲和否定大跃进。他说：“对于大跃进的理解，应该是整个历史时期的增长。”“我们社会主义能够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完全能超过资本主义，这是大跃进。苏联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攻击的矛头直接对着毛主席。

#### （十）在出国留学学生中散布“技术第一”“和平共处”等滥调

蒋南翔一贯崇外、媚外，反对自力更生，鼓吹“技术第一。”他叫嚷：“完全没有外国资料是不行的，完全不懂外语，我们原子弹也不能爆炸。”“乒乓球比赛还只是精神上的荣誉，科学技术竞赛要重要得多，失败了要挨打的。”蒋南翔在外事工作中极力散布和平共处滥调，大搞合二而一。他把学习外语比喻成是生物的“同化”“异化”作用。他极力抹杀国际上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要同学们去受“同化”，去“适应”资产阶级生活和政治环境。

## 抗拒毛主席指示，反对中央方针政策

### （十一）对抗毛主席的“春节指示”

1964年2月，毛主席的“春节指示”和三月毛主席关于学校课程讲授考试方法问题的批示，明确指出，学制太长，课程太多，讲授不甚得法，考试以学生为敌人，都要进行改革。蒋南翔对毛主席这些重要指示。耍反革命两面手法。就在同年三月底召开的名为传达贯彻毛主席“春节指示”的高等学校领导干部会议上，他大讲什么“方针正确”“成绩很大”，加强了“党的领导”，“思想教育有所加强，教学质量有所提高，师生的思想面貌有了显著的变化”等等，来对抗主席的批评。蒋南翔还反对以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来进行教学改革，并有意歪曲主席的“春节指示”，他胡说：“春节座谈会上，毛主席只谈了学制、课程、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等业务问题，偏偏没有提阶级斗争。”会上他唆使他的爪牙出来攻击毛主席的指示，说什么我体会毛主席的讲话对中小学、对大学文科更适用一些。”

另一方面，蒋南翔提出“继续大力贯彻少而精原则”，以他的智育第一前提下的“少而精”代替了毛主席关于四个改革指示的全部内容。他还反复强调教学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实际上是抵制改革，不准革命。

### （十二）对抗毛主席的“七·三”指示

1965年7月3日，毛主席在批示中说：“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1/3。”蒋南翔在同年8月高教部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上，打着贯彻毛主席“七·三”指示的旗号，大唱反调，说什么“以减轻学生负担，增进学生健康而论，虽然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但回顾历史，大家还是做了不少工作，如五年制工科院校的总学时几经削减，已由解放初期的4200多学时下降到现在3000以下。”他根本否认毛主席批评的高等学校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他还极力抵制砍学时，说什么“涉及深入教学改革、提高师资、改进领导等一系列问题，绝不是单纯砍掉一些学时，控制一些活动的问题。”因此，他不去认真减少课程学时，以减轻学生负担，却掉头矛头大砍政治活动。他针对学校积极开展政治活动的情况，别有用心地说：“要爱惜民力，使民以时，滥用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要保护学校秩序，实行关‘闸’。”把这次会议变成

了一次反对突出政治的会议，为对抗毛主席的“七·三”指示做了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

### （十三）抗拒毛主席对清华大学的批评

1959年，毛主席批评清华大学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宁左勿右。”蒋南翔对毛主席的批评一直心怀不满，到处讲主席的批评“不符合事实”“清华的知识分子政策是贯彻得最好的”等等。甚至疯狂攻击毛主席说：“到底对缺点的程度如何估计，我脑子里没底……，材料（指反映清华的材料）中讲的一些情况是否如此严重，我还怀疑……。材料要相信，但要看出它在总的趋势中的位置，要加以分析批判和综合，否则人就不起人的作用，人不能为材料所统治。”

### （十四）违抗毛主席的备战方针、指示

蒋南翔极力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备战方针。中央指示要加快一些学校的建设速度，要和帝国主义抢时间，要求在X年内建成。蒋南翔不去认真执行，反而在下面吹阴风，他别有用心地对干部说：“X年建成我怀疑，X年建成就不错，X年也好嘛！”还说什么“不是国民党逃难。”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备战方针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诬蔑。

中央指示，新校建设中要贯彻“干打垒”精神，“生活设施从简”，做到“低标准、高质量。”蒋南翔同中央大唱反调，到处讲“不要为了省几个钱，今年盖了明年就修，修的钱，比盖的钱还多。”叫嚷什么：“这阵风要顶住。”公开对抗中央的指示。

1965年10月，蒋南翔在公开表示不同意“低标准，高质量”，认为应该提“高标准，高质量”，还宣传什么“高其所高，低其所低。”在建校中搞起了高楼大厦，追求形式，讲究布局，多占土地，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蒋南翔还无视国务院严禁建楼、馆、堂、所的规定，和国家计委多次不许搞风雨操场的意见，在六五年学校领导干部会议上，指示各校安排风雨操场和五百人的大教室（实际上是小礼堂）的项目。国家计委对高教部上述错误提出了严厉批评，蒋南翔极为不满，一面组织反扑，一面写假报告欺骗中央，真是胆大包天。

### （十五）对抗中央提出的“三查节约运动”

1965年11月，中央明确提出，要在1966年开展“三查节约运动”蒋南翔马上跳出来极力反对，他在65年12月高等学校总务工作会议上胡说：“搞不搞

运动是工作方式问题，搞不搞运动，由学校党委自行研究确定。”他还在讲话中强调“增产节约要并提，防止片面”，并恶毒地说：“电机系、无线电系只有一本讲义，一支粉笔，实验室什么都不要，最省钱也照样能上课。过去国民党的学校就是这样！”他硬把我们的“三查节约运动”跟国民党学校连在一起，充分暴露了他的反动本质。

当XXX工学院负责人向蒋南翔汇报开展“三查节约运动”的情况时，他抓住“没有核实”，这句话大做文章，污蔑学校反浪费运动“搞糟了”“失败了”，指责学校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顶住这股风。”

#### （十六）反对党的监察工作

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工作机构的决定，中央监委于64年向高教部派出了监察组，由于监察组陆续反映了学校一些严重问题，蒋南翔就大为不满，当面斥责监察组“为什么只看见问题，不看成绩”，他有意在工作上制造困难，竟然无视中央监委关于监察组长列席党组（委）会的规定。部党委开会，很少通知监察组组长参加。特别是监察组反映了清华大学的八城市高等学校篮、足球比赛中严重的铺张浪费和建校工程中违反中央的方针等问题。蒋南翔更是大发雷霆，阴谋调动监察组的工作。尤其令人愤慨的是，他在济南召开的学校领导干部会议上，公开反对八届十中全会对党的监察工作任务的规定，疯狂叫嚷：“监察组的工作任务还需要考虑”等等，他的狼子野心猖狂已极。

### 蒋南翔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重要干将

#### （十七）蒋南翔与彭真的黑关系由来已久

蒋南翔与黑帮头子彭真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早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就和彭真一起工作过，1946年曾一度任彭真的政治秘书。1952年，彭真把蒋南翔安排到清华大学任校长，并兼任北京市委高校党委书记、市委常委。1960年调高教部以后，仍与彭真和旧市委来往频繁，关系很密切。

#### （十八）蒋南翔眼中没有毛主席，他把大黑帮彭真捧上天

1965年三四月间，蒋南翔捧（应为奉——编者）彭真之命搞了一个“关于高等学校如何开展社教运动的意见。”这个“意见”中吹捧彭真说“正如彭真同

志所指示的设计部门的社教运动，主要是解决设计革命的问题，高等学校社教运动也应该是深入解决教育革命问题。”1965年，在首都“一二·九”运动纪念会上，蒋南翔遵照彭真的意旨，曾两次离开讲稿说：“直接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就是今天到会的某某同志。”彭真被揪出后，蒋南翔公开为彭真辩解。发泄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不满。

1966年5月9日在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彭真跟主席这么多年，做了很多工作，主观上是努力领会毛泽东思想的。这次学术批判一犯错误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市委还要一分为二。”他又和高教部的一些干部说：“彭真在起草高教60条过程中的许多意见，今天看还是正确的。”5月16日，中央批判彭真的汇报提纲的通知发下后，蒋南翔散布“彭真不该找许立群，彭真认错人了。”直到66年6月3日，还在高教部全体党员干部会上吹捧彭真，说什么“一二·九运动时，彭真要北上，我要南下，后来证明彭真是对的，我做了检讨。”“在东北时，彭真没有把农村的斗争方式搬到城市，没有把城市搞乱，彭真也是对的。”

#### （十九）积极推行彭真的修正主义路线

1961年8月间北戴河会议讨论“高教60条”时彭真支持蒋的意见，蒋后来也多次吹捧彭的意见是正确的。1965年2月，彭真在传达中央《二十三》条精神时，歪曲党的阶级路线，蒋南翔紧跟彭真，只讲表现，不讲成分，只看业务，不看政治。1965年初，彭真支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平向北大革命派反攻倒算时，把蒋从农村四清的地方找回来，共同谋划镇压和破坏高等学校的四清运动。蒋根据彭的旨意，起草了《关于高等学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与中央《二十三》条唱对台戏。许立群把这个修正主义文件作为起草中央文件的基础，还叫蒋南翔到北大社教工作队作了报告。1965年12月，蒋南翔在高教部总务工作会议上大肆宣传彭真的“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后来在济南直属高等学校领导干部会议上，又配合彭真抛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大讲对知识分子要采取放的方针。

#### （二十）蒋南翔追随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阴谋活动

彭真的反党活动被中央察觉后，彭与蒋一起商量退却对策。1966年3月18日蒋南翔与邓拓、范瑾、宋硕等人在彭家密谈。彭命令邓拓、宋硕赶制帐篷，要在短期内把一万多文科师生全部轰下乡，抵制文化大革命，并让蒋南翔、邓拓等

搜集对陆定一的意见。4月8日上午，彭真打电话要蒋南翔马上去他家里，彭告蒋南翔文化大革命要大搞，并向蒋透露，中央已经批评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指使蒋把半工半读文件提高调子，要增加“当前学术领域内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高等学校有些系，有些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等内容。4月16日，彭真指使北京日报发表了假批判，真包庇的《编者按》，耍舍车马保将帅的花招，蒋积极呼应。蒋南翔不听康生同志的惊告（原文如此。惊告应为警告——编者），背着康生同志，经过彭真同意，急急忙忙于17日召开京津14所高等学校学术批判座谈会，让黑帮陆平、程今吾、孙泱等人介绍了“经验。”后来，蒋南翔怕露了马脚，一面向李富春同志、康生同志写假检讨，隐瞒了4月17日会议是彭真指使的重要情节，一面又通过宋硕连夜通知北京、天津地区的高等学校“紧急刹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二十一）与修正主义旧北京市委的黑关系很深

蒋南翔先后担任了七年旧北京市委常委，不仅与彭真经常来往，而（且）与黑帮刘仁、邓拓等也经常鬼混。蒋南翔在刘仁家混到深夜外出，坐在一个汽车里，形影不离。1966年2月1日，蒋南翔会同邓拓、陆平、宋硕等黑帮参加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开学典礼。邓拓在会上大肆放毒说：“吴晗同志的问题，拿起千斤重，放下二两轻……。”蒋吹捧说：“邓拓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很全面、很深刻、很重要、很具体，我完全同意，希望大家好好学习。”

旧北京市委“三家村”大黑店被革命群众揪出来后，蒋还说：“吴晗的问题还好办，现在不好办的是，邓拓与吴晗一起发表过一些文章，搅在一起了。”蒋两次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说：“在市委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要支持市委。”还散布：“市委在领导工农业生产方面成绩很大，困难时仍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

#### （二十二）蒋南翔和陆定一穿一条裤子

文化大革命以来，蒋除了尽量洗刷他与彭真的黑关系，还摆出一副一贯反陆定一的面孔。Y（疑为蒋——编者）过去因争权夺利，虽有些矛盾，但他们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是同心协力的，比如陆定一一贯反斯大林，不反赫鲁晓夫，反教条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反左不反右。蒋尾随其后，唱一个调子，陆定一反对毛泽东思想，污蔑毛泽东思想是白莲教的符咒，污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是“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蒋拼命反对毛主席语录进课堂，认为很容易搞成“庸俗化”，陆百般抵制毛主席的教育思想，积极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蒋就按陆定一的“指示”办事，大搞修正主义。

#### （二十三）勾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枫

蒋南翔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枫关系也十分密切。据揭发，近几年来，他是和林枫联系最密切的一个人，每周都要通过几次电话联系。蒋南翔拟提拔高沂等三反分子为副部长，事先写信向林枫征求意见。在彭真的组织下，1964年林枫和蒋一起积极破坏北大社教运动，疯狂镇压革命左派，期间蒋曾将前北京市委国际饭店、民族饭店反攻倒算会的文件亲自交给林枫。1965年“一二·九”纪念会上，蒋讲话中大肆吹捧彭真这个讲话稿事先征求了林枫的意见。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揭发此事。林枫极力包庇蒋说：“蒋南翔的话并不错，他是做自我批评嘛！这事我知道。”

#### （二十四）大力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抹杀高等学校的阶级斗争

蒋南翔从来阶级斗争观点分析高等院校的形式（原文如此——编者），甚至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蒋南翔仍是只片面强调“形式大好”，否认高等学校存在阶级斗争。他在一系列的重要会议上经常贩卖的陈词滥调是“形势是好的，工作在前，成绩是主要的。”当有些同志提出高等学校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时，他就组织围攻和打击。

1965年1月，蒋南翔在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是一株与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唱对台戏的大毒草。他只讲高教战线“呈现一派大好形势”，根本不讲高等学校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他极力掩盖高等学校存在的严重的夺权斗争，大叫什么“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进一步扫除深入教育革命的思想障碍……”等等。蒋南翔反对在学校开展阶级斗争，经常叫嚷说：“在学校一提阶级斗争就容易打屁股”，胡说什么“在学校搞阶级斗争，我吃过苦头，要死人的。”

#### （二十五）破坏高等学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春，正当全国高等学校准备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蒋南翔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说：“高等学校一般不会有两面政权，应该相信”，说“农村打倒地富是敌我矛盾，高等学校有其特点，不是这样。”胡说什么“在学校社教运动中提出要上纲，在思想上方法上不对。”“是思想上有框框，不从实际出发。”



主张“关于三面红旗的态度问题是认识问题，检查一下，提高认识就可以了。”为了包庇高等院校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蒋南翔一手炮制了《关于高等学校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意见》，在这个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性文件中，他借口“不能照搬农村一套，明目张胆地与《二十三》条相对抗。提出高等学校社教运动的目的仅仅是，一、“统一领导思想，更好地贯彻教育方针。”二、“健全学校的领导核心，加强党的团结。”三、“坚持群众路线，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不仅如此，蒋南翔还由彭真指定直接参加了镇压北大革命的“领导小组”，与许立群、邓拓、宋硕、陆平等三反分子共同策划了斗争北大革命派的罪恶活动。文化大革命中，陆平仍极力为陆辩护，说什么陆平是敌我不分，躺在市委身上等等。❏

教育部革命联合委员会批蒋战斗队 1967年3月24日

清华大学冶金系焊接教工刻印 1967年3月31日

## 【读者来信】

### 1. 越人对321期彭德怀一文提出意见

《记忆》第321期关于彭德怀的那篇文章，个人有一点小意见，就是全文似乎对彭与刘之间的历史恩怨完全未涉及，据《彭德怀全传》记载，毛65年和彭谈话的最后，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你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吧”。彭和刘的恩怨，由此也可见一斑，刘在庐山积极斗彭，七千人大会上指责彭在党内搞小集团，与这段历史恩怨都有联系。当然时移世易，刘和彭的关系也肯定会发生变化，但在讨论毛刘彭的复杂关系时，对于相关的史料不妨看得更全面一点。❏

### 2. 胡之杨问《清华文革亲历记》的出版情况

纽约的朋友告诉我，华忆出版社最近推出了罗征启先生的《清华文革亲历记》，此书在罗先生撰写的书稿上又增加了十一个附件，还有《记忆》319期的《纪念罗征启专辑》。使这本书十四万字的原著，增加到了三十多万字。

我想知道的是，大陆的人怎么买到这本书？它的价格是多少？如果贵刊有这

方面的消息，请告诉我。谢谢。

编者回复：华忆出版社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本刊一两年前曾用专刊介绍过它出的书。近两年，给我们提供这方面信息的朋友不再跟我们联系了，所以，我们对华忆的出版情况也跟一般的读者一样，只能从亚巴逊、巴拉巴等购书网站上得知。据查，罗征启著《清华文革亲历记》确实已经出版了，在上述网站上即可购得，价格是44.98美元。☑

### 3. 余敏玲谈《镇反沉冤》的编排

非常高兴得知《镇反沉冤》的英文版问世。但书讯放在目录的最后，实际上却出现在页13，是否能调整一下？以利读者查找。

编者回应：您的意见很对。需要解释的是：本刊目录的编排顺序，一是【思想文化】，二是【百年历史】，接下来是【评论】【怀人】【往事】等。因为《画说我的一生》一般放在【百年历史】栏目的第二篇，而第一篇文章的结尾不可能占满一整页，因此在《画说我的一生》之前会出现空半页，甚至大半页的情况。而《画说我的一生》必须另起一页才便于排版（顺便说一句，排这种以图有主的文章是很麻烦的事，每一次编排都要为它费很多时间）。如何填补它与前文之间的空白是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

以前我们用“逸事”把空白补上，这一期用“书讯”来补白。如果按页码来排，那么，目录上就会出现这样的情景：【百年历史】【逸事/书讯】【百年历史】，也就是说，无论是“逸事”还是“书讯”都不适合插在目录上的两篇【百年历史】之间。所以我们只能把它们放在目录【百年历史】之后的某个地方，目录与页码的不一致就是这样造成的。以后打算用一个图案（花草或风景）来补白，这样就不会产生目录与页码错位的问题了。☑

##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l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